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5年1月31日第1期
总第124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24期

目 录

【专 稿】

丁 东 口述历史与毛泽东时代的反思

——在“毛时代的民间记忆及其对历史学的影响研讨会”上的发言

【随 笔】

启 之 “脱裤子”·“割尾巴”·“洗手洗澡”——“红色话语”小议之一

【札 记】

胡庄子 读萧军日记（一）——日记中毛泽东等高级干部的形象

【评 论】

李南央 对历史尽责，为卡玛辩诬——我看王容芬的《卡玛和她的网站》一文

董 佳 从橡皮泥到董狐笔——简论党史研究

【考 证】

印红标 西纠成立日期考

【访 谈】

戴为伟整理 冷卫口述（一）——文革中的贵阳中学

【述 往】

朱 特 插队的那些事（七）——去兵团的故事

安希孟 安希孟回忆录（六）——我与文革

【简 讯】

田三分 “毛时代的民间记忆及其对历史学的影响”国际研讨会在法国召开

常 林 《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两卷本在香港出版

【资 料】

陶鲁笳传达最新指示：“今后不许打人”

附：卜伟华对毛泽东说的“今后不许打人”的论析

关于右派分子戴煌的材料——1962年戴煌的十万言书（五）

【读者来信】

1. 汪春劼的感想

2. 庄菁瑞、邵小鹰谈辛逸的《新瓶装旧酒》一文

【专 稿】

口述历史与毛泽东时代的反思¹

丁 东

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我感到十分荣幸。会议的主题“毛时代的民间记忆及其对历史学的影响”，对我很有吸引力。

—

我想先区别两点，一是毛泽东时代的民间记忆，二是对毛泽东时代的民间记忆。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区分？

所谓毛泽东时代，就是毛泽东统治中国的时代，即 1949 年到 1976 年。如果有所扩展，可以追溯到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 40 年代，但地域范围就要缩小到中国共产党统治区。

毛泽东去世以后，就不是毛泽东时代了。可以称为后毛泽东时代，也可以称为邓小平时代；或者把华国锋当政期间命名为华国锋时代，华国锋下台后命名为邓小平时代。我们讨论的民间记忆，是毛泽东时代的民间记忆，还是后毛泽东时代对毛泽东时代的民间记忆，就成了需要探讨的历史学问题。

在毛泽东时代，民间基本上没有表达记忆的物质条件和心理空间。毛泽东是一个高度重视历史的统治者。他在延安见到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中译本，如获至宝，把它列为整风文献。在中共七大召开之前，他就主持了《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他的历史观，统一了中共党内的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发展史成为全体官员、全体专业技术人士和全体大学生、中学生的必修课。毛泽东的历史观和对历史的议论，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历史准绳。到了文革时代，《毛主席语录》的发行量超过中国人口的总数，人人背诵。毛的历史观进一步普及，比如用阶级斗争学说和“五阶段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解释人类历史，用“三次革命高潮”

¹ 此文是作者在“毛时代的民间记忆及其对历史学的影响研讨会”上的发言。

（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解释中国近代史，用“三个里程碑”（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解释国际共运史，用十次路线斗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解释中共党史，用儒法斗争解释中国古代史，都成为叙述历史的不二法门。毛泽东是魅力型政治领袖，他掌握了全部传媒和教育讲坛，成功地实现了全民族的洗脑。包括我在内的几代中国人，都曾是毛泽东历史观的虔诚信徒。统治者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中国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已经失去了独立的记忆能力。即使是政治上受到歧视和伤害的人们，也习惯于按照毛的史观来塑造个人记忆，希望自己能被主流承认，而不敢对主流思想有什么异议。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独立的民间记忆，不只是大逆不道，而且是根本不敢想，或想不到。像创办《星火》那样的知识分子，在毛时代的八亿中国人中，只是凤毛麟角的先觉者，数量非常稀少。我研究民间思想史多年，也只能列举陈寅恪要求不宗奉马克思主义，顾准日记记录大饥荒、人吃人，质疑斯大林对历史的强奸，遇罗克主动调查1966年大兴杀人案等为数不多的例子。这些独立的民间记忆，只是一些闪光的碎片，当时不能传播，不能交流，不能形成与主流史观相抗衡的影响力。当然，也有一些底层百姓，没有被主流宣传格式化。比如我在1965年刚上中学，到北京郊区下乡劳动，请贫下中农忆苦思甜。老贫农先讲旧社会怎么苦，最后说最苦还是60年到62年。我们大为震惊。这种民间记忆，不见诸文字，更难以进入史学的视野。

现在对毛泽东时代反思性的民间记忆，大多是毛泽东去世以后形成的。中国人从毛泽东的光环下脱魅，有两个重要契机。

第一个契机是七十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从1976年的四五运动，到1979年的民主墙，标志着中国民间觉醒的开始。上层权力博弈，给民间质疑毛泽东的创造了契机。华国锋是毛泽东提拔的领导人，是文革受益者。邓小平、陈云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他们要取华国锋而代之，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晚年，舆论上对他们十分有利。1980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按照邓小平、陈云的需要，在肯定毛泽东建政和否定毛泽东晚年之间达成平衡，让历史为他们的合法性背书。官方对毛泽东晚年一定程度的否定，当时打开了公开反思毛泽东时代的表达缝隙。当时影响最大的反思之声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并扩展到影视、绘画和人文学术领域。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

中国人，开始走出洗脑状态，独立的记忆被唤醒，被激活。

第二个契机是八九风波、“苏东波”和冷战的结束，一批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摆脱了对毛的个人迷信，跳出了官方的意识形态束缚，告别了马恩列斯毛的历史观，对人类文明史和当代世界图景，对中华民国史和共和国的历史，都形成了多元的评价尺度。有了新的史观，个人经历、家庭记忆、家族命运，就会形成新的叙事。目前探讨的对毛时代的民间记忆文本，多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二

口述历史只是历史学的一种研究方法。研究历史，可以通过采访当事人的口述，也可以通过查阅文献档案的笔述，各有优势和劣势，两种方法也可以结合起来使用。这本来是史学研究的常识。但是，对于反思毛泽东时代，重建民间记忆，采用口述历史方法，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环境所决定的。

对毛泽东时代的反思虽然从80年代初已经起步。但官方担心反思毛可能伤及体制的根基。邓小平提出宜粗不宜细。按照对其自身有利的原则，简化了毛时代的历史图景和政治光谱。之后的当政者，大体沿袭了邓的基本结论。但也有微妙的调整。邓强调否定文革。他要在人事上洗牌，把造反派和文革受益者从官员中清理出去，以防身后生变。后来的当政者没有这一需要，于是对毛时代的历史，特别是有关反右、大跃进、文革等负面事件，采取尽量回避的态度。邓小平去世后，主调从简化历史转向了虚化历史。从此，有关毛泽东时代的学术研究、文艺作品和回忆录受到严格的控制和审查，在大众传媒中很难看到毛泽东时代的负面信息。大中学校的教材，涉及毛泽东晚年，往往只有简单的结论，没有相关的史实。以至于当今中国的青年一代，比如80后，90后，00后，普遍不清楚毛泽东时代是怎么回事；一些青年根据片面宣传，对那个时代作出一厢情愿的美好猜想。

礼失求诸野。反思毛泽东时代的动力，从体制内转向体制外。一部分民间人士，出于良知，拒绝遗忘，为延续历史的记忆做出了坚忍的努力。

民间研究毛泽东时代的难点之一，就是权力中枢的不透明。毛泽东深居简出，他的许多活动细节隐藏在历史的黑箱里。查阅档案是研究历史的基本途径。中国虽然颁布了档案法，规定不同的档案十年到三十年应当解密。但真正核心的

档案其实根本不解密。有的档案一度公开，又重新封闭起来。高文谦利用档案撰写了《晚年周恩来》以后，连官方的党史专业研究者查阅档案，都受到限制。民间人士查阅重要档案，就难上加难了。这样，口述历史就成为一条打开历史黑箱的途径。毕竟有一些历史当事人活着。不为人知的历史就在他们的脑海里。十年来，我采访了李锐，和李南央整理成《李锐口述往事》一书出版。我太太邢小群采访了何方，整理成《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一书出版，都是口述历史的尝试。此外，我们夫妇还采访过李慎之、何家栋、吴祖光、萧乾、邵燕祥、唐达成、曾彦修、钟沛璋、戴煌、梅娘、杜光、郭道晖等曾经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采访过江青的秘书杨银禄、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文革中的风云人物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采访过四五运动的代表人物陈子明、贺延光，他们都讲述了许多毛时代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通过对他们的采访，我的体会是，口述历史往往比档案记载更鲜活，能够捕捉更多的原生态细节，在现象层面的挖掘上，具有明显的优势。有些重要的历史关节，根本没有留下文字记载，口述历史甚至成为唯一的史料线索。口述历史采访对象是个人，讲述的是个人的命运，有具体的心理动机和行为逻辑。进入具体的个人，而不是把个人消化在模糊的群体之中，或许能更真切地感受历史深处的脉动，让记忆更加丰富多彩。这是历史的宏大叙事所缺乏的。

在共产党内当过高官的人有保密的习惯。他们写回忆录特别谨慎。但口述时可能脱口而出，谈出一些被遮蔽的细节。他们的口述史，价值往往高于官方组织撰写回忆录。民间记忆不等于底层记忆。一些退下政坛的高官，一些在政坛斗争中的失意者，如果能跳出官方的框架口述往事，也可以归入民间记忆的范围。

当然，口述者记忆有误很难避免。人在讲述往事的时候，会有选择，有避讳，有自夸，按照当下的利害重新构造过去。愿意说过五关斩六将，不肯说走麦城，超越不了个人恩怨。获得高官厚禄的人缺乏说真话的冲动。受了冤枉和磨难多的人，倾诉冲动强烈，有时也会感情压倒理智。与档案文件、日记、书信这些当时的文字记录相比，口述在准确性方面确有弱点。这就要求采访者事前了解口述者的背景，可以通过追问，逼近历史的真相。同一事件，可以采访多位历史当事人，或者与文字档案互相比对，尽量减少口述的失真。

人类已进入网络时代，史官文化日趋捉襟见肘。权力可以规定官方的宣传基调，但控制不了民间的记忆表达，这是口述历史在大陆方兴未艾的重要原因。■

【随 笔】

“脱裤子”·“割尾巴”·“洗手洗澡”

——“红色话语”小议之一

启 之

裤子系于腰间，附于双腿之上，前遮后掩，为高人雅士所不齿。几百年前的英国绅士们，在社交场上提到裤子的时候，常用 indescribables（不能够描写的东西）、one-must-not-mention-'ems（决不可以提及的东西）或 unspeakables（别说出来的东西）等委婉语来指代。陈原解释说，“那时上流人等神经过于敏锐，或者说他们都是假道学之流。一提到裤子，就会想入非非，竟至于想到不道德行为。”¹ 如果某些中国人，像鲁迅说的那样，一看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私生子，那么，这些英国绅士的想象力也不过尔尔，其特异处不过是用想象力跨越了一座大山——脱。

上世纪四十年代，这座大山被中国的现代“愚公”搬走了，“脱裤子”不但堂堂正正地上报了刊，腾于众口且响彻会场，而且还向纵深发展——先是从“脱裤子”联系到“割尾巴”，后来又走向了全面化——“洗手洗澡”。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由胡乔木撰写，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教条与裤子》。社论批评某些领导干部和留苏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中不能触及自己：“他们高叫道，大家要洗澡啊，大家要学习游泳啊，但是有些什么问题发生在他们的贵体下了，他们总是不肯下水，总是不肯脱掉裤子。”“有些好心的同志说，裤子是要脱，但是只能秘密地脱，在群众面前脱不但有伤大雅，而且敌人和反共分子还会在旁边拍手。”这里的“裤子”和“脱裤子”都是比喻，“裤子”相当于遮羞布，“脱裤子”是把羞处露出来。羞处指的是教条主义。应该说，胡乔木很有想象力，这个比喻很大胆，很恰当，也很粗俗。

学者说，延安改变了文风，把五四时的现代白话改造成了革命白话。后者的

¹ 陈原《语言学论著》卷一，辽宁教育，1998，页83。

功绩之一，就是使“不登大雅之堂的村言土语，毫无阻拦地进入‘高贵’的文学圣殿。原先令文化人有心理障碍和视觉障碍的字句，从此也不被忌讳地使用……过去目为粗下的语言，以‘人民群众’概念取得由政治保证的优势。”¹“脱裤子”就是借着这个优势升堂入室。

“脱裤子”之粗之俗，源于生活。鲁迅说，他小时候听女佣阿长讲故事：长毛占城时“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²

王蒙的老爸北大哲学系毕业，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留学三年，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最高做到北京市立高级商业学校校长。王蒙说他小的时候，“父亲与母亲吵闹，大打出手，姨妈顺手拿起了煤球炉上坐着的一锅绿豆汤，向父亲泼去……而另一回当三个女人一起向父亲冲去的时候，父亲的最后一招是真正南皮潞灌龙堂的土特产：脱下裤子……”³

从无知无识的女佣到北大毕业的海归校长，都如此执迷于脱裤子的威力，可见其文化底蕴之深厚。如此深厚之文化势必会在艺术中反映出来，也势必会博得大多数人的欣赏。王若水讲过这样一件事：1949年开国前，共产党解放军进城后。有一天晚上，中共北平市委在东交民巷原德国大使馆的礼堂举行京剧晚会，毛泽东来看戏。那天晚上演的节目里，有一个是两个人打赌，“议定谁输了谁脱裤子。输者一输再输，裤子脱了一条还有一条，一直脱了六七条，终于不能再脱了。毛泽东似乎看得很开心。”王若水奇怪，“毛主席为什么喜欢这种庸俗不堪的戏呢？”⁴

尽管“脱裤子”只是一种比喻，也免不了让人想入非非。王若水对这个词就颇有腹诽：“那时，把一个干部做检查也叫做‘脱裤子’。我很不习惯。心想还有女同志在场。啊，女同志做检查也这么叫吗？”⁵

王若水的担心是多余的。那些经过延安整风的知识女性，神经元早已粗硬如枯藤，脸皮也锻炼成了树皮，“脱裤子”一类的语言对她们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因此，当艾思奇的要求刚解放不久的知识分子：“脱裤子要彻底，把最后的

¹ 李洁非：《手抄〈讲话〉疏解》，《信睿》2012/12。

² 《阿长与山海经》。

³ 《王蒙自传·半生多事》，花城，2006，页14。

⁴ 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朴人眼中的伟人》，香港明报，2002，页511。

⁵ 出处同上。

遮羞布也要去掉”的时候，¹她们不但没有一点反感，而且很乐于向未经此役的知识女性们传授在延安“脱裤子”的经验和心路历程。

要说传授经验，还是首长现身说法效果更佳。1952年初，薄一波在北京大学的民主广场上给全校师生做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一个甲子过去了，还有人记得他那生动有趣的言传身教。当时，薄一波除了讲为什么要开展这场运动之外，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都有整肃革命队伍的光荣传统，说在延安常搞运动。运动一来，大家先把自己的问题讲清楚，统统说出来，不来一点隐瞒，使自己能轻装上阵。这叫“脱裤子”。他说，今天我们又得来这个，“他说着说着，就用手比划解腰带做脱裤子的动作，嘴里还同时大喊：‘脱裤子嘞！’”²

“脱裤子”只是开始，脱下来是为了“割尾巴”。在上述社论里，胡乔木告诉那些“红色教授”：因为“他们的贵体下”“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而且每个人“尾巴的粗细不等”，割尾巴所需用的“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因此只有先脱掉裤子，才谈得上“用刀割”。“裤子上面出教条，这就是教条和裤子的有机联系，谁要是诚心诚意地想反对教条主义，那么他第一着就得有脱裤子的决心和勇气。”

显而易见，这里的尾巴，也是一种比喻。这个比喻很形象，很生动，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六七十年代，农村大搞“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把农民在房前房后种的庄稼蔬果，多养的鸡鸭羊猪统统割掉。这个比喻还有很强的再生能力，“翘尾巴”、“夹着尾巴”、“露出尾巴”纷纷由“割尾巴”生发出来。

“裤子”联想到的是人的私处，“尾巴”联想到的是动物的肢体。“脱裤子”尽管带有色情意味，但毕竟还是把人当人。“割尾巴”、“翘尾巴”、“夹着尾巴”、“露出尾巴”就不同了，它是把人当成了猪狗马羊猴。

建国初，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来了，考虑到这些知识分子没有延安整风的洗礼，神经还不够粗，脸皮还不够厚，于是把“脱裤子”改为“洗澡”。这里的“洗澡”，其实是“洗脑”——在公众场合，向领导、同事、学生交待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做自我检查和批判，由与会者进行帮助。如果上级想放过他，大家又没有什么意见，这“澡”就算是“洗”完了。对于一些需要教育的重点人物，运动的组织者则发动积极分子给他一洗再洗，并加大“水温”和“搓澡”的力度。

¹ 《学习观念的革新》《文汇报》，1949年8月25日。

² 宋文坚：《旧事·新北大旧事》，时代文化出版社，2013年，页161、125。

如果被洗者表现不好，就把他“挂起来”。

从社会语言学上讲，“洗澡”既是“脱裤子”的委婉表达，又是“割尾巴”的逻辑引申。

为了让这个“澡”洗出效果，浴池的经理们想出了各种办法，也就演绎出一连串巧妙而形象的比喻。首先是“水”的多少，洗大盆、中盆还是小盆。这里的“水”，指的是群众；盆，指的是会议；盆之大小，指的是会议的规模，参加者的多寡。一般说来，职位高的，如校长、院长之类，洗“大盆”；职位低的洗“小盆”；不大不小的洗“中盆”。普通的教职员虽然自己不洗，但也不能闲着，他们得给被洗的搓澡。在具体洗法上，各校有所不同，多数学校规定，没有多大问题的教授洗个“小盆澡”即可。清华大学则把洗小盆的标准降低到了讲师一级。其次是“水”的温度。“冷水澡”是指交待和批判的都大大地不够，“温水澡”表明揭发批判的还不彻底，“热水澡”是给那些问题大、态度恶的人准备的。比如北大的法学院的教授周炳琳，就洗了多次“热水澡”。

“洗澡”的效果与被洗者的心理承受力有关，最坏的是把人“洗”死——清华大学化学系主任、著名的无机化学家高崇熙不堪大盆之洗，仰药而死。北京大学有七个人自杀身亡。其次是把人“洗”得死去活来，如清华的华罗庚因保留了出国护照被扣上了怀念美帝的帽子，华不堪诬蔑，决然赴死。复旦的刘大杰上课吹牛去过欧罗巴，“洗澡”时被揭穿，面子过不去，跳了黄浦江。北大的沈从文屡次过不了关，先割喉后切腕。值得庆幸的是，这些人都获救未死。周炳琳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强，但总过不了关也不是事，后来毛泽东替他说了话，才出了浴盆。极少数的顽固分子因为不好好“洗澡”，在运动后期被“挂起来”——这个词表明，在主办者眼里，他们成了衣帽一类东西。

越十年，四清来了，因为有个清账目、清仓库一类的反贪内容，而贪污又是伸手的结果，因此“洗澡”之外又加了个“洗手”。又过了两年，“洗手洗澡”进了北京市委的文件：“采取集训办法的好处：……便于教师洗手洗澡，坦白交代，有利于工作组做到胸中有数。”¹ 这期间，有多少人因“洗”而亡，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汉语的粗鄙化由腠理而入膏肓。

再到后来，“脱裤子”、“洗澡”就成了党内斗争的常用语。1966年5月

¹ 1966年7月14日《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送审稿）》。

18 日，林彪在中央常委会上大讲“防止政变”，弄得与会者人人自危，不得不跟着林彪大批彭罗陆杨。“多年赋闲在家的元老如朱德不明底里，在发言中走了题，被责讼‘脱裤子’检讨。”周恩来则在随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发言中，不断地检查自己，“不断地洗澡。”¹ 这种澡，他一直洗到了生命的终点。

有人问我，大陆语言为什么会如此粗俗粗卑粗鲁？为什么台湾就不像大陆这样？我初步的看法是：这与彼此尊奉的文化有关。大陆高扬工农文化，城市向农村看齐，知识分子向工农学习。工农化深入大陆的各个角落。而大陆的政权又是战争中夺来的，战争所不可须臾相失的游民文化、流氓无产者文化，在建政后登堂入室，占居主流。台湾重传统，崇儒学，四德八维，为民立极。作为社会中坚的中产阶级，在继承了老祖宗的士绅文化传统的同时，又从西方吸收了资产阶级的主流文化。一下一上，一土一洋，两岸文化殊途。■

2012-11-22/24 三稿

2015 年元月修改

¹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 110，127，明镜出版社，2003。

【札记】

读萧军《延安日记》笔记（一）

胡庄子

无论从敌军或友军射来的箭，箭是一样的。
……我是要从这些伤害的刀丛中行走的，
过去，现在，将来也均要如此。……
当然我还是以一个文学者的眼睛
看一切，是有些欠妥。¹
——代题记

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到延安。他住在延安，读书，写作，与共产党人、文艺界人士交往。后来，因为与人发生磨擦，主动要求住到乡下去，自己动手，砍柴，种地，在乡下住了三个月，又回到延安，被安排在中央党校，直到1945年11月离开延安。这期间，他每天记日记。于是，有了这本《萧军日记 1940—1945》（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笔者以为，这是中国目前最好的日记之一。

《萧军日记 1940—1945》是一个作家笔下的延安，是红色延安的现场记录。它不同于国民党政治宣传中的延安，也不同于政治童话中的延安、革命圣地中的延安、神圣回忆中的延安、政治教科书中的延安。它是一个青年作家和鲁迅弟子眼中、心里、笔下的延安。

萧军这样评说自己的日记：我只是把它做为一具“摄影机”，认为什么应该照的就照下来；作为一个画家的“速写簿”，要写的写下来；作为自己无所不谈的“朋友”；一具分析自己、分析别人、分析凡所遇到的自己认为有用或有兴趣的任何事物；分析自己某些思想和感情；分析自己的某些善的、恶的，……动机和闪念的“分析器”；自己心灵自白的“上帝”；灵魂散步的旷野……（《我的罪名、罪行和罪证（1969年3月26日）》）

这部日记，记载了萧军与中共推心置腹的合作共处，记载了萧军与党人的思想行为冲突，与党员文人的角色冲突，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冲突，与女人们的冲突，

¹ 摘自萧军《延安日记》（42-7-24）

以及他与自己内心的冲突……

日记中毛泽东等高级干部的形象

在延安期间，萧军和毛泽东多次谈话，接触比较多，对于毛泽东的印象和评价，他都一一记在日记中。

他在日记中描写毛泽东：为了吃烟过多，他的牙根大部变黑了，脸色黄的，有些浮肿，眉毛是稀薄的，眼睛常常是睡眠不足的样子，下巴上有一个小瘤，生着几根毫毛……从他的脸上看不出棱角，眼睛也没有桀骜的光，他是中国读书人的样子。（1941年7月20日，简写为41-7-20，下同）

1942年2月8日，他听了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的演讲。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会议的现场：“他很精彩和恳切骂了这些用党八股的人是鬼风，阴风，狗叫……。每个听着的人全是那样幸福地笑着。”他评价毛泽东说：他是很好的一个中学教师，有一种能溶解别人感情的能力，这大概就他特殊的地方。他讲话是通俗的没有学究气，也没有艰涩或深奥的地方，那是一般的。如果说他是领导者，还莫如说是教育者。（42-2-8）

1942年4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夜读了毛泽东在党校开学时演讲的文章，这是扬长避短流畅的有才华见解的文章，但我总感到他缺乏一种沉潜的，深刻的，艺术的力量！他是太中国式的，感觉式的，他应该更深沉，锻炼成一种深刻的、悲剧似的力量。马克思是不同的。（42-4-28）

他评价毛泽东说：他是爱趣味的，自得其乐，有些农民顽固性……我要和他韧性战斗。他现在正读着鲁迅小说和杂文，这对他底深度有大帮助。他有点孩子脾气，有点弄聪明和幽默的脾气，有点沾沾自信的脾气。他居然也和我发起文艺见解来了，我只好听着。他要在老婆面前卖卖聪明。我为了使他喜欢，我又重复了一次我对他“整顿三风”和“文艺座谈会”的赞成，他克制着自己的兴奋。他说丁玲幼稚，不说态度，不肯丢包袱等……他和丁玲在某些方面有相通点，大约全是湖南人的缘故。他是爱称赞，鼓励，怕泄气的人。无疑，他对我的意见作为非党代表那样重视的，他对我也是怀着相当限度的矜持的……甚至想相机给我些小打击，但这是无用的，我的精神力量，足以控制任何人。（42-6-2）

他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评价说：这只是一本概括性，说明性的文

章。它底长处是明白通畅。短处，文章组织不精密，平面化，缺乏一种深沉的，集中的，鼓动与震撼的力量。文章作风不统一，欠严肃，轻佻，报纸作风，感觉性的，比喻和幽默得不恰当，缺乏一种斩钉截铁的力量。（43-6-21）第三次读《新民主主义论》后，又评价说：毛的文笔轻快流利，说理明白，这是一种中国型的天才。（44-3-22）——萧军说毛泽东的文章有“报纸作风”，看得准确。早在1913年，毛泽东20岁时，他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就嫌毛的作文像新闻记者手笔。（《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上卷第14页）

萧军认为：毛泽东他不是哲人，学者，他是农民性的中国式的自然主义式的领导者，单纯的政治家。他的惟一长处大约就是能够在松弛里含孕着一种神经性的力量，也就是“大智若愚”的表现吧？同时萧军也告诫自己：我还要耐心来理解他，寻到他的规律性。（42-1-1）

1942年5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是一个喜欢在不意中给人以一个钉子碰的，他喜欢用暗示的方法，这也就是他的战法和处事作人的方法：先引敌深入，而后包围之，一般人是易于失败的。我们相处是在“砺智”的阶段中，我相信我会影响他，他有些方法和态度也有益于我。他是阳柔阴刚，我是阳刚阴柔。我是先击破而后包围之，他是先包围而后击破之。虽然我们的目的是一个——为了革命和艺术。他是爱荣誉容易感动的，但也容易飘忽过去。……他是一条张得的弓弦，有易感，又松弛。他是优秀的，非雄性的，非雄伟的。农民性的，自发的，感觉的……。按艺术来讲，他是近乎希腊的，女性的，非是文艺复兴男性的，佛罗凌沙的。

他在日记中记载：据说，毛泽东自己说他的知识等是从报章、杂志上得来的。这使我明白了他底深刻性限制性了。（43-9-14）

他评价毛泽东说：我听他讲话感到很喜悦，大约是因为熟了的缘故，感到他是很配作为一个政治领袖的。（41-11-6）他是有天才的，但是感觉性的天才，后天蕴藏性不够，是一个经验性的天才，哲学性不够。深度不够。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和政论家……但不是一个深刻的，洞察一切的思想家，行动的力量象征，精神崇拜的象征。是一个明敏有余，影响力不足的人。（43-6-21）他分析自己与毛泽东的区别：他是**颠预**的，我是尖锐的……我愿意承认，从他和朱德那里给了我一些做人的影响，那就是他们的缓和与宽厚。从鲁迅先生那里所得的，却是深刻、艰苦、忍受和认真不苟，实践、严肃、坚贞的精神。我将接受这三个人物的所长。

(41-10-2)

他比较毛泽东与周恩来：他缺乏一种深沉宏大的力量，他和周恩来倒是可以长短相辅的。周是机敏，决断，长于事务，但是只像个政治工作者，缺乏大政治家一种深沉更远见的东西。（42-8-16）周恩来和毛泽东，在性格和作风上是两个决不相同的人物，前者是南方性的，宽柔的，聪敏的，粘液性的，谋略性的人物和作风，后者是北方性的，严峻的，果敢的，意志性胆汁质的人物和作风。——前者富于归纳、理论性，后者较强实践性。（44-6-4）

他比较了鲁迅与毛泽东：鲁迅——对于中国国民性认识底深刻性，韧性，战斗的精神，严肃性，深沉性，这和毛泽东底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政治认识的全面性，政治策略运用的灵活性，忍耐的能容的力量——正是对照的。这是表现着思想家和政治家不同的特征。鲁迅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正被毛泽东具体而实现了。他们底关系是宽与深，灵魂与肉体，一致的，相成的，一句话：——一个新中国底两面表现。他们必须结合，将来的新中国必须这两种东西——鲁迅文化精神，毛泽东的政治制度——融而为一，才是一个新中国——这是他们的理想的结晶。……在文学、精神上鲁迅先生是我唯一的先生，对于毛在政治上我也愿以他为先生，为这政治理想而战斗！但我却以兄长的地位看待他。（44-3-22）

他说：从鲁迅先生那里我学得了坚强，从毛这里我学得了柔韧。他们全是这时代的精华，我应该继承这些长处。（42-2-10）

萧军在日记中也记载了毛泽东向他诉说自己的苦闷：“我在党内受过十一次处分，但是我什么也不说，我不向任何人说我的意见，因为这违背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我是一直准备着孤立，甚至连老婆我都不说……准备她看我垮台去另嫁旁人，准备只剩下自己。这还不够，我准备一个脑袋……人在热闹场里没什么，能经得起寂寞，冷落，别人瞧不起……我是从来不报私仇的……但是是非讲明白……只要他不变成坏人……在党内要讲王道，对敌人在他不缴械时就得要讲点霸道……我早先很自由，一从到了军队里就不自由了，等于死一样……不自由勿宁死啊！”（42-2-10）“我真不自由啊！随便做篇文章，随便做一篇演说，随便走动走动……哈哈，那全要‘决定’，每一个字全要讨论过……”“在我没入党的时候，那多自由，手提包一提，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42-4-27）

毛泽东说，《红楼梦》中喜欢的人物是贾宝玉。（41-9-4）

萧军送给毛泽东一些书。他自信地认为：我们要互相教育，互相影响，互相帮助，这里面毫没有不洁的动机，我希望他更深地理解文艺，理解鲁迅先生，这对于革命，他自己，文艺本身全有好处。人对于应该做的事一定要勇敢地去，绝不该为了一些平庸的顾虑而失去了时机。（42-5-29）射人射马，擒贼擒王，必须先改变了他，才能改变了所有党员们的卑俗倾向。（41-12-25）自己对于毛泽东以及其余的人们的影响，一定很大，虽然他们决不会在口头上承认。

（43-5-31）我却应该默默地帮助他，不使别人知道，不伤到他的自尊。（43-6-21）

萧军认为：共产党一直到如今，缺乏一个道德上的，思想上的，行动上的，毫光四射的灵魂，这就是一种有精神感化力的领导者。毛泽东似乎缺乏这样一种力量，也许他的显现这样力量的条件还不够，没到时机。（43-4-4）

萧军想影响毛泽东。毛泽东则是通过萧军这样一个典型人物来了解知识分子、了解文人，从而制定中共的文艺方针政策，并将知识分子纳入到自己的阵营中，为自己的政治服务。两人的目的，应该是都达到了。萧军在延安，对于毛泽东的最大影响可能是，引起了毛泽东对革命文艺的重视。

萧军在1942年5月2日的日记中说：“下午一时半去杨家岭办公厅参加由毛泽东、凯丰等召集的文艺座谈会。这个是延安从没有过的举动，这也是自己这二年来，间接直接工作出来的结果，我可以如此说。”这话可能说得有些“满”。毕竟，他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所见所闻有局限。他不知道，毛泽东在那些日子里，紧锣密鼓，与许多文化人座谈。毛泽东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和他的著名讲话，并不是从萧军一个人那里受到启发和滋养……

这里顺便说说萧军在日记中没有记载的他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话。萧军1987年回忆说：毛主席致开幕词后，要我第一个发言。丁玲也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第一个开炮吧！”我就第一个发言了。胡乔木回忆：萧军第一个讲话，意思是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温济泽回忆说：萧军是最激烈的一个。……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他这样说，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在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我觉得你们整风是“露淫狂”。你们现在整顿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转引自李洁非的《会议》）——从这些回忆可以看出，当时的会议还是比较民主、宽松的。

书归正传。且听我，为君续吟短长——

萧军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和江青之间，一定存在着一种矛盾。那恐怕是都市气和乡气。也存在一种习惯的矛盾，江是飘浮的、不爱思考的、趋新的，毛是沉稳的、爱保守的……（41-10-2）。他观察到，毛泽东“对于江青很有些父女的感情的样子”（42-6-2）

他说：我和江青谈了一些话，觉得她并不如我所想象那样坏，是一个薄命女人相。（41-8-12）他发现：蓝苹，她是个有个性的女人，她似乎还在怀念着章泯。（41-8-14）“这是个刚强好斗的女人”（41-9-10）。对于江青，这是个愚蠢，庸俗，浅薄的人。她对于毛泽东不会有什么帮助的。（42-3-22）

《萧军日记》中对延安时期的军政大员也有不少着笔——

他眼中的朱德：有着一一种军人的风度，有宽大的头额，浓黑的眉毛，抛流线形的嘴，黑的脸色，长毫毛的眼睛。（40-10-7）这是个善良有力单纯有一种可尊敬父亲感情的人，我在他的面前感到自己单薄，年轻，甚至引起某种孩子的感情，一种讨好的感情……事后觉得很羞耻。朱德确是一个宽厚的人，一个纯真的现实主义者，爱平庸不爱锋芒、爱实际不爱空谈的人。……朱这人是具备着一种深沉的讽刺的力量的，一只眼睛微小些。他讨厌那些卖弄才华的人，也不满那些只爱才华不爱真实工作的人……。（41-9-22）

他说朱德的夫人：路上遇到朱德的老婆，她有一个疤眼。……（舒）群说她老了，在前方的时候，她还像一个农家的姑娘。（41-5-5）

他看王明：长胖了，像一个资产阶级的小官员，面部是没表情的，头表示自负和骄傲地扬着，两只手分撑在身子两边像只螃蟹脚似的。声音是单薄的，无有潜在的力量，言词是一篇流行的社论文章。他用的手法是拍一拍每一个人的肩膀，表示照顾周到，表示他预备过了。他是一个十足的政治工作者，他绝没有大政治家那样魄力、热情、深刻有力感人的力量。（40-10-7）这人不深入，只是一种文字和口头的工作者，不是一个精明干练的实践者。（41-2-22）这是一个精敏，狡猾，事务主义的党人，十足的小鬼头气，浮动，没有深沉智慧的人。他女人是一个黄瘦的小眼睛庸俗的人。王很有资本主义下公司里办事人员的派头。他不能够很安静地听取别人的话，总有自己主张的样子，我和这样的人是没什么共通的地方的。（41-2-29）

他看洛甫：他只是在那里随喜公事而已，这是一个温和主义的人。（40-10-7）

洛甫虽然不是一个有什么特殊见解的人，但还不庸俗，可以谈的，我对他印象感情全很好，他们对我似乎也诚意，更是他的女人——瘦小精干的人。……我也告诉了我“天下人，管天下事”的主张，他们大笑。（41-3-18）

1942年3月29日，他第一次见到贺龙：我和贺龙是第一次见面，从传言中知道他一些故事，从我的眼中观察，这是个浮动的凭感觉做事的人。有些土气和江湖气，有时也故意装作大动作的样子。吃着大烟斗，鼻子不高，头也不大，眼光不亮。喜欢两腿叉开。我和他讲话很少。（42-3-29）

他说林彪：林是个狭小的，理性很强的人，但缺乏一种深沉的镇定人的力，他会不寿的。（42-3-29）林彪是一个近乎阴暗的，胸襟狭小，矜持的人，这不是一个大将材料，而且不像长寿的样子。（42-6-25）他看到了林彪的“新娘子”：那个新娘子我是常见过——像个日本人，面额很宽，小身材，穿一双新刷过的白鞋——中央研究院的学生，但我不知道她的名字，那是庸俗寡情的样子。（42-7-8）

王震在他眼里，“是个有点小聪明而跋扈的人”。（42-4-4）这是个切实的、有为的聪明的、有铁路烧火工出身的军官。曾受过五次枪伤，年纪也很轻。我对他的印象较第一次改好了。（42-5-3）当王震谈到读了《八月的乡村》后，萧写道：这次我们又有了更深一层的接近。这是个“正经人”，是可以往来的。（42-5-4）

他说胡乔木：这人是第一次正式认识，是一个平庸的人。（41-4-19）他“可卑的无知”。（42-9-14）这人是有点酸溜溜的，狭小，但是忠实的。（43-6-6）我对此人底说话有些酸溜溜，故意俏皮而又俏皮不好的地方，感到不愉快。

（44-4-7）他说：彭真，这是个急性的多血质的人。（41-8-22）他眼中的李富春：李富春是个精明的事务人员，有一点硬派的样子。（41-11-6）

他喜欢革命老人徐特立。他说：这是一个纯洁的老人，一个使徒式的革命者。可爱而又可敬。（42-10-10）他看艾思奇：是一个正派人，对我无什么恶意的样子，谁知背后如何。（43-4-18）我觉得这人是忠诚正派的。（43-6-17）他在日记中写道：李鼎铭与一个阴险、刁滑、残刻的老妖精，很有大官僚的样子。（43-4-18）

《延安日记》中，萧军随手记录了对领导人的直接观感，那是最近距离的，是直观的，也是未必准确的……■

【评论】

对历史尽责，为卡玛辩诬

——我看王容芬的《卡玛和她的网站》一文

李南央

王容芬的文章

年龄渐大，每天过眼的东西不少，记下的却不多。王容芬（下面简称“王”）刊登在2008年2月香港《开放》杂志上的那篇《卡玛和她的网站》（下面简称“卡玛”）是例外之一，只缘文章所述实在太过离谱。我曾向《开放》的总编金钟请教，他发来了王确认她文章所言属实的答复，更是让我吃惊：书写历史竟然如此地随心所欲！

本以为这种思辨阙如，不讲道理的文章读者不会把它当回事，没想到在“政治风波”二十周年来临之际，封从德发出致《天安门》制作人的一封公开信，与柴玲对该片制作组“长弓”长达两年的诉讼相呼应。封从德在他的新书《六四日记》中说：“我从王容芬这篇文章开始了解到卡玛隐匿的文革经历”，并称卡玛是“文革中当红的造反派头目”，将王的“卡玛”一文当成指控卡玛的经典依据。这就不只是对《天安门》影片的质疑，而且是要将该片的制片人卡玛彻底抹黑。

良心让我不能不提笔，这不单是为卡玛个人辩诬，更是对历史尽责。很多经历过文革的人已经去世，再过二三十年，整整一代人都要走光，我们亲历过的那些事情，将成为纸上的历史，后人再研究时，只能凭借留存下的史料。作为文革的亲历者，我有义务留下一份可以让后人与王文比对的资料，供他们辨别真伪。

王在《卡玛》一文中说：“那时她叫卡玛丽达，六十岁以上的北京人，很少不知道这个名字的。它比宋要武、彭小蒙们响亮，仅次于蒯大富、王大宾们。卡玛丽达是外籍人员子女造反派的头头，人民日报上有她的照片。”这段陈述远离了当年的真实情况。我和我的丈夫文革开始时都是北京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当年完全没有听说过卡玛丽达（或卡玛）这个名字；说卡玛的名声“比宋要武、彭小蒙们响亮，仅次于蒯大富和王大宾们”，不知道王的这两个“们”包括了几位数，

反正在当年北京学生心目中的“造反名人”里，是数不出个卡玛丽达的，况且北京老百姓了。不过我认识的人中有在文革前听说过卡玛的，是因为她在北京中学生运动会得了铅球冠军，这个漂亮的外国姑娘引起参加运动会的男生的瞩目。文革前的体育尖子和文革中造反出名的学生不是一回事，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王在此段陈述的句尾用了语焉不详的“人民日报上有她的照片”作为“卡玛丽达是外籍人员子女造反派的头头”一说的脚注，这就更不对了。我们那一代北京中学生，对曾一度被罩在文革舞台聚光灯下的耀眼人物——宋彬彬、彭小蒙在《人民日报》上的照片有着极其深刻的印象，若那时真有一个“外籍人员子女造反派的头头”卡玛的照片也出现在报纸上，且棕发深目，高鼻蓝眼，会至今记忆犹新——大脑皮层在崇拜英雄偶像的青春年华留下的信息是抹不去的。事实是：凡是现在大陆青年人认为很“酷”的美国、台湾、港澳、高干、明星、老总……，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始，经过一次次严酷的政治运动，到了文革，均已变成最毒、最黑的东西。1966年文革初期，在“血统论”红卫兵的眼中，卡玛只能是美帝国主义的“狗崽子”，我自己那时是反党分子李锐的“狗崽子”，深切地知道“响亮”一词与“狗崽子”是没有任何缘分的。

王在文章中还说：“人民日报曾经登过卡玛丽达和一群外国专家子女参加大串联回到北京的照片，冠以偷梁换柱的标题《卡玛丽达与辛顿夫人率美国青年代表团到京》。”金钟告诉我：“王容芬特别说明1966年冬天人民日报报导‘卡玛丽达·辛顿夫人率美国青年代表团到京’一事的荒谬。报导中照片上的‘辛顿夫人’正是卡玛本人，而率美国……到京，给人印象是来自美国的代表团支持文革来了。其实是卡玛带领一批外籍子女串连回到北京。说卡玛是外籍子女红卫兵的头头，这是被当局高调宣扬的事实。”凭文革过来人的亲身经历，我可以绝对地肯定王的“特别说明”是伪说，但还是请一位熟悉资料检索程序的朋友帮助查阅当年的《人民日报》，我需要用事实说话。这位严谨负责的朋友反复察看了多遍，结果不出我的判断，从1966年6月北京中学生红卫兵登上历史舞台到1971年4月中美关系开始解冻这一期间，卡玛和她的长辈的名字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出现过一次，遑论照片了。他们的名字和照片现于《人民日报》是1971年4月以后的事情，那时逐渐有了一些美国人士来访的报导和中央领导人接见他们的照片，这其中有了卡玛的长辈和她本人。但是这种接见和报导均是毛泽东改变其

外交策略的一部分，王将此作为卡玛是红卫兵头头的证据，是完全站不脚的。

我的朋友也找到了王说的那篇“辛顿夫人率美国青年代表团到京”的报导，它刊载在1971年9月30日《人民日报》的第四版上，兹录全文如次：

美国青年一行十七人到京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由卡麦丽达·欣顿夫人（注：原文如此）率领的美国青年一行共十七人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今晚乘飞机到达北京。到机场迎接的有关方面负责人有席道崇、程齐虹、邢泽、林晨、朱良等。欣顿夫人在我国的亲友韩丁、雷洲安、史克、阳早、寒春等也到机场迎接。

对照这份原件，王文和她对《开放》总编金钟的“特别说明”共有八处不实和错误。详如下：

1. 王所说的报导标题是错的：原标题是《美国青年一行十七人到京》，而不是《卡玛丽达与辛顿夫人率美国青年代表团到京》。王在这个自己编造的标题里还套进了另一个错误，把“卡玛（麦）丽达·辛（欣）顿”中将“名”跟“姓”分开的那一点“·”换成“与”字。这是对常识的忽略？还是有意地将一人变为两体，分离出个卡玛，便利自己的指控呢？我不得而知。

2. 时间大错：这篇报导的时间是1971年9月30日，不是王对金钟所说的1966年冬。1966年的中国，美国是头号敌人；从敌到“友”的转换始于1971年4月毛泽东因势利导的“乒乓外交”，这之间中国外交策略的演变可谓天翻地覆，五年之差非一般之误。

3. “报导中照片”之说不实：那天的报导根本没有照片。

4. 阐述不实：这篇报导说的就是辛（欣）顿夫人率领美国青年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访问，乘飞机到达北京，不是王所说的“其实是卡玛带领一批外籍子女串连回到北京。”在刊登了这篇报导的1971年的9月，政府早完成了对我们这批老三届中学生的“就业”处理，我本人即是在1968年2月15日离开学校进入工厂的，文革大串联早已是明日黄花。说卡玛他们在这年的九月“串连回到北京”，根本就不可能！即使按王所说的，此报导发生在大串联还在进行的1966年冬天，也仍然是天方夜谭。那时北京城四十公里以外的交通要道都立着“外国人非经许

可不得逾越”的牌子，一支全由外国孩子组成的串联队伍，别说自由游走于中国大地，连出北京城都不要想。

5. 历史背景错位：王说“1966年冬天人民日报”将“卡玛丽达和一群外国专家子女参加大串联回到北京”一事“偷梁换柱”成“《卡玛丽达与辛顿夫人率美国青年代表团到京》”。文革时期的毛泽东独断专行登峰造极，全国上下无人能免于毛即法的恐怖。在那个年代，先于毛泽东五年向美国示好，加以报导，且是“偷梁换柱”地报导有个头号敌人的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国，不要说《人民日报》的编辑，就是周恩来，借他一百个脑袋，也不敢干这种事情。我们这些过来人能相信王的这种臆说的恐怕不多，但是没有亲身经历的年轻人保不齐会相信王的话。以学者的身份把历史搞得如此的面貌全非，太不应该了，这是遗祸后代。

6. 违背事实地夸大渲染：该则报导所占篇幅是块“豆腐干”，其他出现有卡玛名字的报导，也没有任何一篇在任何一处提到卡玛是外籍人员子女红卫兵的头头，王的“这是被当局高调宣传的事实”一说，实在是违背事实？惟恐不伤人。

7. “‘辛顿夫人’正是卡玛本人”断言大谬：卡玛的奶奶和卡玛同名同姓，中文译音都是卡玛丽达·辛顿，或者《人民日报》音译的卡麦丽达·欣顿。卡玛丽达是卡玛曾祖母孩童时一个西班牙女友的名字，出自天主教的一个典故，她将这个名字给了自己的女儿（卡玛的奶奶），卡玛的奶奶又将这个名字给了自己的孙女（王文所说的卡玛），这种传承姓名的方式在西方并不稀奇。非要把从美国到中国访问的“辛顿夫人”张冠李戴给她的生活在北京的孙女“卡玛丽达”。

8. 结论错了：王说，这篇报导“给人印象是来自美国的代表团支持文革来了。”我不明白，什么样的思维逻辑，会从上述报导中得出“支持文革”的“印象”。

对这样一段只有一百零八字的短讯，王的引述和解读之错误、之不实有八处之多，她在文章中对卡玛其他的连根据都没有提到的指控，可信度能有多少？

历史地看待寒春和阳早

王在“卡玛”一文中引用了卡玛的母亲、姑姑等四人的一张大字报。其实这本来是他们递交给国务院专家局的一封信，是后来被人抄成了大字报张贴出去的。王即使全不知情，只要认真地分析一下，做出这个判断也不是件难事。这四

个人正在向当局诉求与中国人同等的政治权力——这其中当然包括了写大字报的权力，在未获批准之前，他们是不会轻举妄为的。王全文引用了那张“大字报”中提出的要求：

1. 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2. 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3. 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4. 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群众；5. 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6. 我们的孩子和中国的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7 生活待遇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8. 取消特殊化。

王随后说：“卡玛家族如愿以偿，和中国人一样投入了文革暴力。”卡玛长辈们提出的这八条要求，即使用今天最严厉的评判眼光，也无法让我同意王的说法。也许第五条“三大革命运动”会令今人有所质疑。三大革命运动的定义是什么呢？“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个运动是那个时代每一个属于人民范畴的中国人都必须投身其内的，而卡玛的母亲和姑姑、姑父作为外国人，被与普通的中国人隔离开来，排斥在外，他们所要求的无非是：“请像中国人一样平等地对待我们”，摆脱被孤立、受猜忌的难堪境况。

卡玛的姑父阳早和姑姑寒春的故事，是我们这一代中很多人都知道的。寒春来中国之前是在美国的洛萨莫斯国家实验室从事原子弹的研制，几年前我参观过那个实验室的展览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美国政府创立这个实验室时告诉科学家们的是：研制原子弹不是要使用它，而是要抢在希特勒之前拥有，以制约纳粹德国。年轻的物理学家们抱着早日结束战争给世界带来和平的愿望，在高原荒漠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夜以继日地工作。当他们看到自己研制出的原子弹对日本平民造成的巨大伤害和对生命的摧毁力时，许多人无法承受良心的谴责。寒春就是在那时和其他一些科学家一样，辞去了洛萨莫斯的工作，随后离开了令她理想幻灭的美国，到中国找到正在为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的哥哥韩丁和哥哥的好友阳早。后来她与从事农业的阳早结婚，一同到了陕北农村，帮助那里的农民发展农业和办牛场，一生再也没有碰过核物理研究。记得前几年看到过一个记录阳早、寒春取得中国绿卡和他们在的生活的纪录短片，两位老人在北京郊区的奶牛场与当地的农民亲如一家地劳作，寒春身上穿的是老旧的深蓝色棉大衣，家里的写字桌是用砖头垫起来的。他们拒绝搬入北京城内居住，说是现在的共产党领导变修了，

他们要坚持自己艰苦朴素的革命道路。

我想起了朱学勤在他纪念李慎之先生的文章中记述的一个场景：

“夜色逼近，渐至黑透，谁也不想去开灯，直至看不清对方的脸色。黑暗里，突然听见老人在垂泪，先是沉默，终至失控：‘我李慎之如果能再活一次，年轻时还会入这个党，到老年还是要像他们所谓的那样‘反党’，‘反’他们的‘党’！”这是写出《风雨苍黄五十年》的李慎之，他说的似乎应该是：“我如果再活一次，绝不会加入共产党！”但是，那就不是李慎之了。寒春、阳早、李慎之都是那个时代的人物，都是那个历史、文化环境中生长出的人物。你可以不理解、不赞同卡玛长辈们的追求，但是你至少应该尊重他们那种对中国农民的深切关怀，对理想坚韧不拔，永不背弃的人生选择。王在她的文章中充满轻蔑地将他们说成是：“跑到闹市表白自己的廉洁，……我不信他们上当受骗，利令智昏才干得出这种丢人现眼损祖德的勾当。”如此粗陋、浅薄的言词，真不该出自亲身经历文革惨烈迫害的王容芬之口，读来令人倍感悲哀。

我认识的卡玛

在一些人唾骂卡玛，在柴玲的起诉把卡玛的制片组逼到濒临破产的危境的时候，我要说说我认识的卡玛。

初知卡玛，是无意间在美国公共电视频道看到她拍摄的《天安门》，打开电视，支持学生民主诉求的青年教师梁晓燕，正在批评那些坚决罢课的学生阻止不愿意罢课的学生进入教室，说他们剥夺了别人选择的权力。立即觉得制片人所表述的：诉求民主的人并不一定都理解民主的真谛的见解十分深刻。第一次见到卡玛是在北京，她为新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采访我父亲李锐，那天没有时间深谈，她只是说也想采访我。我告诉她，我在文革中是无名之辈，采访价值不大。但是回到美国后，她还是邀我去他们那简陋的摄影工作室做了一天半的访谈。卡玛说，文革是一个太浩瀚、太广大的题材，可找到的影片资料极为有限，根本没办法拍摄出一部较全面、完整的影片，而文革初是中学生的这一代人成长期间的画面资料相对来说较为丰富，因此选择了以这一代人所受教育的文化土壤为切入点，展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出自各种不同家庭背景的青年人——主要是中学生们，如何

会以那样的真诚和热烈追随毛泽东，卷入进那样疯狂的一场浩劫之中，以及他们的觉醒之路。我们这一代无论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很多人至今都能背诵出毛泽东的这条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当年第一个刊登了遇罗克的《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的刊头，登出的就是这段语录。我当时就觉得、在看过拍摄完的影片后更是觉得，《八九点钟的太阳》这个片名起得极好：我们这一代青少年时期的奋斗、努力，莫不源于自认为是将来主宰世界的力量。我们幸福，是因为我们能投身于革命；我们痛苦，是因为我们被排斥在革命之外；我们最终觉醒，是因为看清了自己哪里是什么太阳，中国只有一个太阳——毛泽东，我们只不过是愚弄、利用的工具。卡玛后来告诉我，他们选择这个片名时确实有一层反讽的意思。对卡玛担纲拍摄的这部纪录片，我的态度是一贯的：卡玛做了中国人没有做的事，卡玛作了我们做不到的事，我敬重她做的工作。

卡玛的摄影工作室让我感受到一种理想主义的文化，陈设十分简陋，唯一显出点气派的是那套音响合成和镜头剪接器材。工作室所在的破旧小楼和小楼居于其中的小小的公园，是一个故去的居民捐赠给那个城市的。市政府要保留这幢历史建筑就需要雇人守护，钱却无来源。卡玛从拍摄电影获得的基金中抽出一部分从市政府手中租来这幢小楼，承诺了维修保养的责任，双方各得其所。一楼有一个小厨房和一张大圆桌，我在的那天的早餐，是卡玛父亲工作过的山西张庄的乡亲们送的小米熬的粥，外加馒头咸菜，中餐是叫的外卖，七八个工作人员和我这个受访者围在一起“风卷残云”。卡玛的丈夫、有个中国名字的高富贵担任摄影，澳大利亚的顶尖汉学家白杰明被请来担任电影的合作者，他就委屈在阁楼上睡觉。有一个我至今记忆犹新的纯清的台湾姑娘，做资料储存整理，还有几个从大陆来的和我女儿年龄不相上下，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的姑娘在那里轮流做义工。

后来影片在旧金山湾区公映时我和卡玛又一次见面，这里的电视台华语节目《话越地平线》采访了她和白杰明。那是个与观众互动的节目，我没想到打电话进来的会有台湾人，他们感谢二位受访者做了一件好事，向他们这些不了解大陆的人展示了那场“革命”的真实面貌。记得有个大陆来的观众打进了一个对影片有意见的电话，问卡玛为什么要拍暴露中国黑暗面的电影，说现在的中国非常好，

不像电影里那样。卡玛回答说：文革中暴露出的问题不是中国所独有的，人性中恶的一面在一定制度和条件下都会极度膨胀，德国就出现过希特勒，美国就出现过麦卡锡主义。我们有责任让人们了解那段历史，以警醒自己，不要在自己的国家里发生那样荒谬的事情。美国“9.11”以后，其实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形，只是程度不同。例如，只因为法国在攻打伊拉克问题上与美国有分歧，就引起一些美国人的痛恨，他们像中国人在文革中把鸡蛋糕改名“斗私糕”，江米条改成“批修条”一样，要把法式炸薯条（French fries）改成“自由炸”（Freedom fries），国会餐厅张贴的菜单都作了如此荒唐的变更。一时间，家家都必须挂美国国旗，谁要是打伊拉克说一个“不”字，就可能被视为不爱国，受到攻击。

我的朋友朱大年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当年也是“狗崽子”。卡玛拍《太阳》一片时把他从北京邀请到美国接受采访，就住在卡玛家里。周末卡玛一家出去滑雪，把一串钥匙扔给他就走了。他打电话给我，感慨卡玛对人的真诚和信赖，说我们素昧平生，她也不怕我把她家都偷空了。

我和卡玛都有个处在青春期的女儿，我常常向她请教如何与女儿沟通交流。不管她多忙，在电话上和我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给我分析美国文化，分析在美国文化环境中成长的中国孩子的心态和问题。后来我女儿到波士顿哈佛大学医学院面试，卡玛到机场接她到自己家，我女儿和她的小儿子一下就成了好朋友，坐在厨房的台子旁边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她的小儿子突然问：“你和我妈是什么关系？你怎么认识我妈的呢？”我女儿一下给问住了，说：“让我想想。我好像并不认识你妈，是你的妈妈拍个什么电影采访了我妈妈，她们就成了好朋友，我也就成了你妈的好朋友。”小儿子认真地点了点头：“知道了。我妈的好朋友特多，我妈的朋友蹲过监狱的也特多。”女儿在电话中说给我听：“妈妈你的朋友特棒！”能让青春期的女儿在我们这些“什么也不懂”的成年人中看得起，不是一件易事。正是卡玛待人的诚恳和温暖的人情，让我把她当成了自己的朋友。对于饱尝过世态炎凉的我，这种品质比信念、成就……更让我珍视。

卡玛网站的意义

王在“卡玛”一文中贬损卡玛的同时赞扬了王友琴，说她“以个人之力在芝

加哥大学网页里建了一个文革网站。”

“以个人之力”，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我知道很多朋友为王友琴网站的建立作过工作，那是不应该被埋没的；还有那些在大陆以极大的勇气接受了王友琴的采访，提供给网站材料的受难者的未亡人、朋友、同事们，他们的力量更不应忽略不计。文革是一场极为惨烈、极为浩大的人类劫难；积极投身于其中的人在运动中的诉求和行为的思想渊源、家庭背景、文化土壤和社会教化之深邃、驳杂，如苍穹间之繁星，几乎难以穷尽，绝对不是王文所表达的：参加文革=投入文革暴力，如此简单的等式。对文革的还原，对文革的记忆，对文革暴行的揭露和鞭挞，对参与其中人的分析……这一切的一切，决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机构可以独立完成的。王友琴管理的中国文革浩劫受难者纪念园里，“为九千五百零一位文革受难者逐一立了纪念页，收录了七十篇纪念文字，一篇珍贵史料，两篇论文。”

（王文）这无疑是非常了不起，非常令人尊敬的工作。卡玛的“Morningsun.org”的中文网页中收集了文革中的很多实物、很多标语口号、很多个人的故事和家庭的遭遇，还原了文革的实景、实地，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它的残酷和荒谬，对文革是另一种角度的揭露，与“纪念园”的资料是互为补充的。王说卡玛的网站“没有一篇论文，连一条文革研究的报导都没有”，是完全不顾事实、既偏执又无端的指责。只要进入 Morningsun.org 的英文主页，点击 library 分页，你就会看到这个文库里收集了大量的中外学者研究文革的英文论文，那些外国学者的独特视角、条分缕析、入理鞭笞，让我这个中国人汗颜。

王容芬在年轻时所占据的思想高度是令人起敬的，但是坐过共产党的监狱，不等于永远地拥有真理，可以随意地把一切与己不同的思考一棍子都打成“红卫兵暴力”。每一个希望能够对历史尽到责任的人，应该学会用民主和理性的方式思想，应该学会包容、尊重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人和他们的观点。只有如此，才能以客观诚实的态度记述历史、剖析历史，才不会像把她投入监狱的人们一样地诛锄异己，永远走不出历史的怪圈。■

写在美国独立节翌日 2009 年 7 月 5 日

定稿于 2009 年 8 月 27 日

【评论】

从橡皮泥到董狐笔

——简论党史研究

董佳

《记忆》第123期《新瓶装旧酒——评〈乡村中国记事〉》读后发人深省。作者提醒我们，学术研究虽无禁区，但有规范和原则；“玩”学术的态度，是千万要不得的。至于文中观点，作为一名党史的文字工作者，我完全赞同。特别是作者对当代史研究和书写的种种看法，乃至对党史学科的定位，都心有戚戚焉。文章主旨，是对李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评介，同时阐释作者对党史和当代史研究与书写的看法。

笔者不学，对党史的定位和发展也有些自己的看法。实际上，关于如何研究党史，以及党史学科的定位，其实都离不开对“党史”这个概念的界定。何谓“党史”？从字面上看，“党”在“史”前，“党史”研究似乎首要考虑的是如何遵守政治纪律，保证不碰红线。可我认为，“党史”之所以称为“党史”，乃如实记录探寻“党的历史”之谓，非为党的历史文过饰非；党史工作者乃独立研究者，而非“党的刀笔吏”。研究中要注意的，并不是一党的政策和纪律，而是找寻历史的真实。归根到底，政治性非党史研究的本质属性，史实才是体现党史科学性的主要依归。

当然，历史有时的小姑娘一样，可以从不同角度、立场，用选取过的材料“任意打扮”，但前提必须是自由精神不死，独立人格不废！“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秉笔直书的历史研究方法，不论世事如何变化，永远是有意义的，绝不会随时间远逝。倘若囿于政治纪律的束缚，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让，研究者无法直抒胸臆，那么，何谈研究？又何来突破？被捆绑着研究历史，还硬要说与世界接轨，硬说融入国际学术主流，这岂不是痴人说梦！

值得注意的是，民间目前有一股历史热。从“清朝热”到“民国热”，再到“党史热”，形成一种有别于官方的独立研究“态度”。这种态度在或公开或隐晦中生长着。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相比那个伟大领袖一手遮天的时代，目

前“强政府、弱社会”的体制内，能出现这种变化，应该说是一种社会思想文化的进步。

在党史领域，围绕一些党史上发生的重大问题、重要人物，现在也俨然形成两个不同的研究群体。一者为官方修史，资政育人是这种革命史观的一贯追求，出发点为执政党的政策和统治合法性背书，研究不越雷池一步。另者抛开哗众取宠者不论，其中一些真正的独立研究者主张不讲政治、不留死角，以国家转型和现代化的眼光，摒弃社会发展有所谓必然性、规律性的僵化、呆板的叙事手法，还原历史的真实性、复杂性、偶然性。两者在研究性质、定位、功能、方法、旨趣等方面均有明显区别，且研究者之间鲜少往来。后者认为前者不够真实，不足为训；前者则指责后者偏离“主旋律”，动辄大棒待之，以致今天笔者竟看到中央宣传work部门某负责人提出关闭133个歪曲党史国史的微信公众号的奇谈怪论。

个人认为，既然党史研究被称之为“研究”，而非“评说”，更不是简单的“讨论”，那么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必须是尊重历史原貌。真相需要还原，谎言必须摒弃。既然历史真相只有一个，你们说的如果是真的，又何必改来改去？研究者的第一职业道德，就是找寻历史的真实。听命于某个政党、某个集团或某个人，那么历史就只能变成任意揉捏的橡皮泥。这样的“历史”怎能“真实”？“研究”岂不变成“戏说”！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近年来，党史上原先早有定论的许多重大问题正在悄悄发生变化，官方评价不断修正。显然，官修历史并非完全真实，民间修史亦非完全戏说。还是那句老话，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转移。在道统、法统都已发生千年未有之大变化的前提下，社情、民情都在发生改变。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与其被动地被形势推着往前走，倒不如主动改弦更张，顺应潮流。

归根结底，党史是历史的一部分，党史研究是从属于历史研究的一个范畴。套用一句西方谚语：“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让政治的归政治，学术的归学术。学术本应与政治无涉。剥除党史的政治属性，使其完全回归历史研究范畴，探寻历史本身的是非曲直，寻求党史的真实性和历史感，则党史研究方法和学科定位的困扰，自然会迎刃而解。■

【考证】

西纠成立日期考

印红标

据《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红卫兵报》，1966年9月1日，第3版），该组织（简称“西纠”）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西纠的主要发起人之一陈小鲁说，西纠是为应对红卫兵破四旧活动造成的混乱而成立的（据1991年笔者对陈小鲁的访谈）。“破四旧”运动酝酿于8月17日深夜，开始于8月20日。这就是说，西纠的成立不可能早于8月20日。另一个发起人孔

丹的回忆说，西纠1966年8月25日成立。¹

北京六中遵义战斗团1967年2月编辑的资料集《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披露了一份国务院下属部门为“北京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拨款的请示和批准文件的照片。（见左图）

这个请示内容简短：“行政处：北京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需要经费伍千元，已经周秘书长同意，由中央行政经费中开支。请你们一次拨给伍千元，由他们掌握开支，以后清算列入我局预算内资金报销。经费处马健1966.8.4”李梦夫批示“同意”

签署日期是“九月四日”，李梦夫第二次批示的日期是“十月廿六日”。

此文献似乎证明西纠在8月4日之前已经存在。研究者胡庄子据此提出：西

¹ 《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第72页，中港传媒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13年。

纠在正式宣告成立之前，已经以“北京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的名义进行准备。可以说，西纠在8月初已经开始运转。¹但是，这种推论与1966年8月红卫兵的状况、其他相关文字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明显不符。

如何解释两条历史资料的矛盾？是否可以做这样的猜测或推测：那份请示的起草者马健在书写时发生笔误，将“1966.9.4”误写成了“1966.8.4”。如果确是如此，日期上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1）9月4日刚过8月，容易发生笔误，顺手写成4天前的月份8（月）。

（2）请示提出的当天即9月4日，就得到了领导的批准，这符合政治群众运动激烈变动时期的情况。如果8月4日请示，过一个月到9月4日才获批准，不太合情理。

（3）最重要的是，如果请示写于9月4日，就与西纠的文献、当事人回忆以及红卫兵发展历程没有矛盾了。

上述考辨结论：西纠成立日期是1966年8月25日无误，其他推测所依据的文本，很可能有书写者的笔误。■

¹ 详见《“西纠”九问》，《记忆》第91期。

【口 述】

冷卫口述（一）

——文革中的贵阳中学

戴为伟 整理

时间：2013 年 10 月 3 日上午

地点：昌平北七家戴为伟家

受访人：冷卫

主访人：戴为伟

记录方式：录音及笔记

冷：我原来是贵州贵阳的中学生，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正在读高中二年级。我的经历和大部分那个时代的年青人是一样的，1968 年下乡插队。插队的地方在广西和贵州交界的红水河边。我插队 4 年，这段时间，应该是我们思想变化最剧烈的时候。

我也是那种（曾经）受过多年洗脑教育，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先不理解，后来听说要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我也很积极。那时候（文革开始），学校里批斗老师，我是有很多传统观念的人，这些事我不积极。但是后来反对进校的工作组，反对省市委，要起来造反，我很积极。

戴：为什么呢？

冷：（批斗）老师嘛，我的传统观念就起作用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觉得这些老师都挺不错的，为什么要去乱骂乱打？另外就是我的家庭，我的父母和这些老师有相似之处。

文革一开始，1966 年“5·16 通知”发了没多久，5 月底到 6 月初，我妈单位的造反派到我家来抄家，夜里来的。当时，我们家藏书，在我妈单位里，可能算第一（多的）吧，有四个书架。他们拖来一个板车，呼啦啦（把书）都拉走了，剩下的大概不到原来的 1/8。

有这些经历（在前），当时自己内心不很意识，但现在可以说，（当时）是暗暗地同情那些老师。所以批判老师我就没有多大的兴趣。我觉得：闹什么呀，整这些人（干什么），我觉得他们都不是坏人。当时贵阳一中（冷所在的学校）是当时贵州省的头号重点中学，一中里省市委官员的子弟、子女很多。我们这样的，当时叫做政治上的边缘人物。贵阳当时有一句话：红五类、黑五类，中间还有个麻五类。贵州（人）说“麻”，就是五花八门的意思。我就属于那种边缘家庭的孩子。老师整天想批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65年，我的班主任还曾经想开班级会批判我。原因是我看了几本书，老跟同学讲书里的故事。班主任最反感的是，我在那里讲《拿破仑传》的故事。苏联人写的一本《拿破仑传》，书中的观点和后来德国人、法国人写的很不一样，那都不管。老师是从四川农村来的，就跟你（我）讲，这些（指《拿破仑传》）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在他的眼中，学习成绩好一点，肯定是白专道路、资产阶级思想。我就成了一个典型，老师老想批判我。我自己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完全就会不自觉地同情这些老师。

但是，红卫兵起来以后，那些干部子女也像其它地方一样，我们学校里到处（被他们）贴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标语。我们这些人，当时没有被称为“混蛋”，但是毛泽东语录——“离混蛋也就50米远”。（笑）

戴：语录里有这句话吗？

冷：语录里有。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判周恩来，说：“你不是右派，离右派也只有50米了。”

当时干部子女们飞扬跋扈，随便在校园里打人，经常打得一些学生抱着头蹲地上，都不敢跑。贵阳还好，我没有看到皮带抽，是扇巴掌。几个红五类，一边打一边骂：“你还敢说红五类打你，为什么不说红五类为什么打你？！你们这种人不打能行吗？！”又踢又打，我们看见，当然是兔死狐悲了。工作组进了学校，是无条件支持他们（红五类）的。我们的校文革、红卫兵，当时都是这帮人，号称要专政。我们班上有四个同学，当时居然不准他们坐在教室里，所有班上的黑五类，连桌子带椅子，一律搬到教室外面的走廊上，便于红卫兵经常来检查。所谓检查，就是几个人走过来，腰一插，就是说：“交代反动思想，揭发反动家庭！”弄得那些同学很难受。我的同座，（与我）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学，老老实实的一个人，也给弄到外头去了，那是我第一次领受到一种心灵煎熬。班上老师同学

总讲，让我和他划清界限，知道我跟他关系好。老是眼睛盯着我讲，要划清界限，这是阶级立场。逼得我走过他面前时，我就不敢像以前那样开玩笑等等的（什么都）敢说。可以，我们俩以前天天坐在同座，天天开玩笑，下班回家，同走一大半路（程），大约有两公里，以前每天都这样的，现在我见到他就不敢打招呼了。同学坐在那里（教室外面），心情很难受，当然需要有同学来打招呼，给他一点友情的支持。我真是打了很多折扣，我也打招呼，（但）开玩笑是再也不敢了，更不敢站在旁边和他聊上半个钟头。我内心很煎熬，当然自己对自己也很不满。

这样等到8月份，南下串联的红卫兵来了，给我们大讲一通，我才知道，啊，原来文化革命是要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的人中有一个科技大学的大学生，现在我都对这个人的动作记得很清楚。那个人用手一指：“什么叫反动路线，学校里的文革小组就是反动路线！”这一下，得到我们这些边缘学生，麻五类们的共鸣。麻五类们很高兴啊。大家都开始给文革小组贴大字报，那我很积极了。那时候有一大堆话，什么“出身不能选择，表现要选择”，什么“要团结95%以上的群众”。我们有话要说啊。

这么一积极，就成为学校里最早的造反派了。到省市委去静坐，要求他们撤走工作组之类。闹得省市委来镇压。贵阳当时最大的事件是“九五事件”，我们到省委去情愿，主要以中学生为主，也有少量的大学生。省委的办法是调来大量的工人，把来情愿的大概100来个学生分割包围，十多个工人对付一个学生。我是9月4号早上去静坐，5号下午回到学校，我的喉咙都发不出声音来了。这种对立更加剧了我们的反抗心理。学校里开会，我们班主任逼着我们所有（上市委）的学生进行检讨。一个跟着我们的哥们儿，跑到我面前讲：“冷卫，你替我们大家写一个检讨，我们认罪吧。”我当时哑着嗓子（不满地）说：“要写你写！”我们班主任老盯着我，说：“有些人反对领导、反对党不是偶然的”，给我扣大帽子。这个班主任不会想到，他给我扣的大帽子，从反面引发我的想法。

过了没有一个星期，就有人上京告状等等。忽然，就有什么北京特大喜讯，中央文革的领导，连同总理、陶铸，接见以后，这说那说，等于我们这派就翻身了了嘛。大家流着眼泪，上街游行，高喊什么“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觉得可是解放了。这样，省会（贵阳）的各个学校都成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当时，（早就成立的）老的红卫兵什么也没有，就叫“红卫兵”。这是

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区别（在中学里的）。

这时候，我在思想兵里就很——积极了。我们班成立了造反派的战斗队，全班有一半同学都进来啦。我们学校，每个班基本上是各占一半，一半是“儿好汉”那样的一批人，一半是“混蛋”或者“半混蛋”。因为成绩好的，历来不受——，不要说重视了，历来不受（得不到）平等待遇的，需要为保证升学率，——我的一个朋友，小学、初中都一同上的同学，我们一同考到这个学校来，到了插队回来，我们都三十老几了，我们这个同学对我讲：“到贵阳一中上学的两年，是最压抑的两年。”那时，整天就是写周记、思想汇报。一开会，班主任也特别巴结那些“好汉”们（干部子弟），老拿这些“混蛋”、“半混蛋”开刀。所以我也觉得那个学校里真的很压抑。64年以后，贯彻阶级路线，我们都觉得很压抑了。我后来想想，后来（自己）能造反，远因就是这几年贯彻的阶级路线。我们忽然就觉得，怎么（自己）就变成了人外人，人下人？！虽然文革开始之前，没有公开整我们，但是整天批判我们。写个周记，拿来（在）全班念，念完班主任点评，完全就是批判的（调门）：“看，揭示不深，没有挖思想根源！”永远是这样。我们几个关系好的所谓的“边缘”同学，劳动我们永远走在最前面；班上出班刊，我们又编稿子又抄写，到出刊的那天，我们两三个人弄到（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回家，一个星期出两期。班上永远是我们吃苦在先，但是（被）批判也在先。这些事，我都感到很不公平了，所以后来变成有造反动力了。刚才我说的只能坐在教室外面的那个同学，后来成了“思想兵”战斗队的队长，我们班的什么造反小组长。

1968年，文革开始告一段落了，我们也回来复课闹革命。之后就被动员上山下乡。那时我就觉得，文革闹了半天，到底目的是什么？原来不是发动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怎么后来弄成整我们这些学生了？而且，到下乡的时候，又很明显，“好汉”们（出身好）就可以去农场，农场的生活有保障；而我们这些人就只有一条路，到农村去插队。当时的工宣队、我们的班主任给我们讲：“插队好，你们要去的地方是亚热带地区，粮食吃不完！”他们（说），他们到底下（农村）去看过了：“贫下中农的孩子拿大的柚子当足球踢，从山上一脚踢到山下（就）不要了，从树上摘一个再来玩，生活好得很，山青水绿，特别的好！”反正是要我们下乡。在学校的事就是这些了。■

【述 往】

插队的那些事（七）

——去兵团的故事

朱 特

一人向隅，举座不欢。因为分队事，雨村知青之间出现了裂纹，坚持集体户不拆散的另外15个人不免郁闷不爽。知青曾数次到旗知青办上访，旗里、公社也都到村里做工作，但总是毫无进展，知青与贫下中农们非常友善地僵持在那里。去兵团的事就发生在这期间，1969年夏末秋初的时候。

那个时候正是内蒙古兵团大发展大组建时期，每天京包线上都有运兵的绿皮车飞驰而过。我到旗里办事曾看到过那些身着绿色兵团服装的同龄人在西去列车里的身影而心生羡慕，如果不来插队，我也许会成为一名光荣的兵团战士。兵团战士的身份比知青要高，算是解放军系列——准军人，发服装有津贴。

那几天三队的女同胞从北京带来消息说，内蒙古兵团正在京城招兵买马，火极了，在此之际，何不去那里改换门庭去当兵。动议一出立刻得到众人拥护，有人还举例证明此路可行。几个高中生在一起合计了一下觉得大有希望，革命前途又现新的生机，不免群情振奋，对前景又充满了希望。有道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上路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知青们说走就走。他们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离开了雨村。知青作家陈村曾写过一篇小说叫《蓝色的旗》，说是插队的知青们都穿学生蓝制服。那身洗得发白的蓝色服装，就成了象征知青身份的旗帜。雨村的知青们也是如此，不仅公家发给知青的是蓝色制服，就是连从家里带来的服装也是蓝色的居多。蓝天下，一行蓝色的身影迤逦行走在通往察素齐的乡间小路上。那里是旗府所在地，也是京包线上的一个三等小站。雨村知青13个人，九男四女踏上了西方去兵团的路程。在一队插队的二饼子和三队插队的一个女同胞留守看家。

二饼子还有一个重大任务：注意“分裂分子”和雨村大队干部的动向。此次行动是绝密级的，向所有人保密更不能告诉“分裂分子”，等到我们大功告成，雨村里就剩下她们了，让她们向隅而泣吧。

从雨村到察素齐40余华里，我只有在第一天是乘卡车到雨村的，在以后的岁月里都是靠着双脚丈量这漫长的路途。13个人到达察素齐车站时已是暮色苍茫，西去的列车已经没有了，只有闪亮的钢轨在昏昏的暮色中伸展到我们的脚下又消失在远远的地平线的尽头。只好等到明天再走了，晚上住在哪儿成了问题，十几个人总不能露宿街头吧，可我们又舍不得花钱住招待所。这时我突然想起前些日子住招待所的事。

那是前些日子，我们七八个汉子因分队事到旗里上访，在旗安办反映完情况后已经是下午五六点，安办的工作人员怕我们走夜路不安全，出于好心把我们安排在旗招待所过夜。

招待所建筑格局呈“工”字状，纵为南北向走廊，东西两侧横向延伸出两排客房。招待所不仅没有围墙，客房四周还种满了大庄稼。我住了一夜，发现招待所的管理松懈不说，许多房间门窗还关不严，到了晚上只在南北向走廊靠近大门的地方有一位老人睡觉，算是值班，此外就没有任何管理人员了。那时流动人员少，很少有客人入住，许多房间都空着。

我向大伙说了这个情况后，就领着众人绕到了招待所的后面。招待所的房间大部分都黑着灯，表明那些房间里没有客人入住。我就专推这些黑屋的窗子，没几下就推开一扇，十几个人便小心翼翼地从此处钻进屋里。然后我又轻轻拉开房门看看东西向走廊里，正如我想象的那样空无一人，于是我大着胆子来到走廊寻找没有锁门的房间，为女同胞找住处。隔壁房间的门一把被我推开，探头一看没人，只有四张床和整整齐齐的铺盖。得，正好是为四位女同胞的准备的。我真没有想到找住处这么容易。

我们男生只好挤在一个房间里了。半夜，突然有人敲门把我们吓得不轻，开门一看原来是一位女同胞，说是谁谁谁害怕得哭了。男子汉们只能悄声给女生壮胆，告诉来敲门的女同胞没有事，安心睡觉吧。她走了，我们都笑女人就是胆小。

一夜无话。第二天太阳刚刚露脸，十几个男女知青又从原路离开招待所，在晨曦中向火车站走去，下一个目标是兵团三师师部——八百里外的临河。

西去临河的列车，最早的一趟要到中午才从这个三等小站经过。我们只能等待。雨村知青的这次重大行动虽然是三队的女同胞们提出的，但在以后的行动中拿主意和做最后决定的都是几位老高三。等车的时候几位高中生对下一步行动作了研讨，觉得西去队伍过于庞大，需要“精兵简政”。于是13个人的西进队伍“整编”成4男4女。留下来的5个男同胞的行止由他们自行决定，是回雨村还是在旗上游玩随他们看着办。

让4位女生去，一是这次行动是她们首倡，再是和当兵的打交道，若诉苦情男生不如女生有优势。男生中有一队的力兄，三队的叶公与寿兄，我之所以保留在西进行列中，可能与昨天找宿的表现有关。

在察素齐等车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熟人，只是面熟而不知姓字名谁，但还知他是个小“佛爷”，同行还有两个中年人。他们是专门“啃大轮”的，从北京一路扒车而来，我向他打听了沿路情况，想从中得点经验。当一列到包头的车开来停靠后，只见他们一齐向车上挤去，没过几分钟我看到一个现役军人满脸怒气向着同伴大骂“小绺”。叶公悄声对我说，这就是那个小“佛爷”干的，不过没有得手，被这个军人发现了，那个两个中年人掩护着那小子跑了。看来，这小子的工作风险还很大呢。

在车上

能到临河的列车终于在中午时分，停靠在我们候车的这个三等小站。

我们到兵团求职的八个人成了雨村知青的代表，肩负着重任，在与被“精简”下来的五位哥们儿挥手告别时，我突然有了一种责任感。而且那时的我心里想得特美：此去一定马到成功，用不了几天我们就会成为光荣的兵团战士。然而两天后与另五位弟兄们的不期而遇竟是充满了戏剧性，现在每每想起还忍俊不禁。

八个人是按照商定好的办法，每人买了张一站地的短途车票上了车。我们依然用短途车票作长途旅行。这趟列车是从呼和发出，到此只是两三站的距离，而那时没有像现在这么多旅行游玩和外出打工的人，所以车厢里还有些空座位。我和叶公找了靠近车厢一头的座位坐下。下面就希望着列车员不要查票。

我乘坐的这节车厢里有一个勤快的乘务员，工作起来尽职尽责，时不时地扫扫地，整理整理行李架。他业务也很熟练，操着带有西北口音的普通话为乘客报着本次列车运行前方将要停靠的站名和时间。一到停车时他便大声地招呼着上下车的旅客。我们刚上车时，他曾热情地问我，你是北京知识青年吧？

但这个业务熟练的列车员穿在身上的那套铁路制服实在是不敢恭维，不仅不合身还油脂麻花脏兮兮的，那张脸也好像多日不洗。还有些旅客对他很熟的样子，一边叫着“二拉动”一边塞给他水果或是别的什么吃的，他也不拒绝。一开始让我看着有点新鲜，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一个特殊的乞丐。再后来我才知道这原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呢。他就是京包线和包兰线著名的编外列车员。“二拉动”是他的名字，这三个字如何写，是不是这三个字，我就知道了。这个二拉动专门“行走”在这两条铁路上，上了车就成了列车员，把列车员的该做的事全部承包下来。大约那些在编的列车员一是有恻隐之心，二是也乐得有这么个人替替自己吧，所以并不难为他。餐车的剩饭剩菜也总有他的一份。

二拉动也是个飘忽不定的人物，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趟车可能到某站他不想再玩下去了，抬脚就下车；也许在某个车站上二拉动有了精神头或是想找口饭吃，兴许就又突然出现在某次列车上。他也有不受欢迎的时候，有一次我乘坐北京包乘组的某次列车时，在一个小站上，二拉动可能想上车为列车员做点好事也为自己的肚皮挣点吃喝，但那些漂亮的乘姐并不欢迎他，我听到一位乘姐扯着嗓子喊：小张——二拉动来了，别让他上车。二拉动果然就没能上得了车。从这次认识他后，我在京包线上多次遇到过二拉动，有时也给他点吃食。这个人到现在最少也有70多岁了，但愿他有个好晚年。

按照二拉动提供的列车时刻表，我们要在凌晨两三点时到达临河车站。一路西来，这节车厢都是二拉动在忙活，真正的列车员还没有出现过，我希望他在临河到站前别出来。

怕什么来什么，夜半时分，真正的列车员出现了，他的出现就是为了查票。这位懒惰的列车员旁边还例行地跟着乘警。查票先查到四位女同胞那里，我看到这四位睡得东倒西歪，那个深沉劲怕是霹雳当头也不会醒的。果然是这样，任凭列车员怎么叫查票也叫不醒这几位姑奶奶，他不得不把座椅背拍得震天响，使全车厢人的视线都集中到了那里，此时再不醒来怎么也说不过去了。只见其中一位

抬起头来一脸的睡眠惺忪模样，微微一笑道一声我们没有票。这神态这笑容把列车员气个半死，我看到了强忍着才没有笑出声来。女同胞们用插队的不幸遭遇和向往兵团的希冀来打动怒火中烧的列车员，想让他网开一面。但对这些不配合查票的女同胞们列车员铁石心肠不为所动，坚持不补票就下车的原则。在列车员的监视下，我们七个被查住的人在五原车站下了车，这里离我们要去的临河只有一站地了。幸运的是叶公成功躲地过了查票得以继续西行。

五原车站的候车室比察素齐的略大些，此时里面挤满了席地而坐的各地旅客，昏暗的灯光下乌烟瘴气，室内充满着烟草和汗臭的气味。我和力兄寿兄本想四处转转，却只见除了车站有些灯光外四周是黑黢黢一片，这里离五原县城还远着呢。回到候车室，看见几个女同胞已经找地方坐了下来，我们也找了块空地坐下。刚一坐下就听得有人和我打招呼，一看，原来是在察素齐遇见的那三个“啃大轮”的人。寒暄了几句，心里却有些打鼓，不过这几个人不“工作”时倒还规规矩矩，连出格的话都没有，几支烟过后彼此无话。我们似睡非睡，昏昏沉沉地等着下一班经过这里的西去列车。

黎明前的时刻西去列车终于进站了。我们随着人群拥向车厢，但守门的列车员小姐却要验票，没票的不让上车。没有办法，只好保证上车后一定补票才得以进了车厢。40余分钟后，列车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临河，这时东边的天际刚刚泛出鱼肚白。

在兵团师部

走出车站马上看到已经先到的叶公，大家会合不免分外高兴。

在这个有着灿烂晨光的秋日，我们八个人沿着一条笔直的乡间公路到了临河县城。这是一座古老的小城，南临黄河北倚阴山，是河套上的名镇，也应当是富庶之地。但那时留下的感觉却是萧条落败，土黄色的建筑土黄色的街道，秋风起处尘土飞扬，似乎还不如我们的察素齐。此地也有北京知青插队，我看到有两个知青打扮的年轻人赶着一辆装有粮食口袋的小驴车从面前急急驶过，一口的京片子，一听就知道是我的老乡。

循着路人的指点我们找到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师部。这是一个很大的院子，整齐的排房就像是士兵的队列，大门口有兵守着，一看就知道这里是驻兵的地方。进大门是接待室。我们进去的时候接待室里还有几位青年男女待在那里。一位现役军人接待了我们，听了我们的请求，他笑了，说，这怎么可能呢，到兵团来又不是赶集，是要有组织有纪律的。我们表达了不达目的誓不收兵的决心，当兵的一指房间里的那几个年轻人说，他们已经来了3天了，我们也不能收么。

原来这几位早来的青年和我们是同道，大家便热络起来，我听他们说话的口音像是我老家冀中老乡，一问果然是。原来他们是当地的高中生，学校里有来兵团的名额，但僧多粥少轮不上他们，不甘心的他们就不远千里私自跑来要求当保家卫国的兵团战士。他们问你们怎么来的？同村的一位姐妹口气很大地回答：扒飞机。众人大笑。

说过笑过，老乡告诉我们，对于他们的到来，兵团也是不欢迎不接收，但这几位死缠烂打以接待室为家，在这吃住了整整三天，得到的回答还是不行。问他们下一步怎么办，他们回答说还要继续坚持下去，还说，这里虽无住的地方但还是管饭。这几位老乡让我甚是敬佩，心想只要有饭吃，坚持几天问题还是不大的。接待我们的军人又对我们进行了一番说服教育，指出我们和这几位老乡之间的不同之处，然后就一走了之，把我们晾在了接待室。中午时分，在这里安营扎寨的冀中老乡从师部食堂打了饭菜吃了起来，我们新来乍到不招人待见，当兵的也没有管饭的意思，看来我们这在里的地位还不如我的老乡。没有办法，饥肠辘辘的我们只好到街上的小馆子找饭辙。面对现实，几位高中生商议着下一步怎么办。

在临街的小饭馆里，我吃了一顿最难忘的羊杂碎：热气腾腾的大碗里五颜六色。红的是辣椒油，绿的是香菜，棕色白色的是羊杂，香味随着热气往鼻子里钻，那味道真是好极了。一位女同胞在40多年后回忆当年事时说，在临河的小饭馆叶公请大家吃了一顿便餐。这，就是了。但我却只记住了吃。以后的岁月我曾无数次再吃羊杂，但总也找不到当初在临河小馆子里的那么香醇的味道了。

下午三位高中生提出建议：再在临河待下去毫无意义，不如光荣撤退。动议一出女同胞没有异议，我自然也是和大伙共进退。在秋阳斜挂西南天际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了临河车站。我没有想到，临河之行就这么快地结束了。满腔报国热情被兵团的官僚们无情地打压下去了。

喜相逢

从临河车站扒的什么车，途中有什么事情，到现在已经一点印象皆无，可见一路平淡无奇。只记得：正好有一列东去的空货车在小站上待发，我们就上了这趟车。在包头列车停了，我们又上了一列空的绿皮车。现在想来，这趟空的绿皮车恐怕就是当年运送知青的专列，完成任务后返回始发站的吧。

这列绿皮车成了扒车者最好的目标，也是最好最舒适的乘坐工具。我的同行者在回忆这件事时说，那节空车厢里就咱们这伙人，人人都躺在椅子上睡觉，你忘了吗？当然没有忘记，我还记得这列火车没有在我们要下车的察素齐小站停车，而是呼啸着一路东行到了呼市西站才停车。车停稳后，我看到从每节车厢里都有人下来。形形色色的扒车者为数不少呐。呼市西站是货车站也是编组站，旅客列车的停靠站在东站。

下得车来还没走几步，迎面遇到车站的革命职工，他们早就张开了网等待着这些目无法纪胆大包天的扒车者。我们一行立刻成了人家的猎物。这样的事我们早就看成是小菜一碟，不惊不讶，对革命职工的命令我们非常配合，顺从地跟着他们来到一座大房子里。

这是一个二进的办公室，革命职工让我们在外屋等着。那好，我们就规规矩矩地站在外屋等着。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耐不住寂寞与好奇，想看看被带到里屋去的那些扒车的人们怎样接受审问。于是我就走到里屋门口伸着脖子往里看。

只见屋里也是一群身着知青蓝制服的人脸朝里站着。看这身穿着，不用问也知道是北京知青了。他们是哪个山头的？我又向门里跨进一步，只见一个男知青正坐在办公桌前接受革命职工的“审问”。那人一边记录一边问：“你是哪个大队的？”那个知青回答：“雨村。”嘿，和我一村的，谁呀，我怎么不认识？我更凑近一步，恰好那人又问姓名，只听回答道：“阿生。”哟，这不是我的发小嘛。我强忍住笑，把脑袋伸到哥们的鼻子底下盯着他的脸大声道：“呀呀——你怎么在这里？”我再一回头，嘿！前天与我们分手的五个哥们一个不少都在这里，立刻办公室里笑声一片。负责“审讯”的人当然不知道这些知青们为什么乐成这

样，他们也无计可施，但仍是慈悲为怀，简单地询问了一下就把我们打发了，走时还告诉我们几点有去车站的通勤车。

原来那哥五个去了草原钢城包头游玩，在回村的时候和我们选择了同一列绿皮车，鬼使神差般地大家又聚合在一起。一伙人在青城小游一番后，在夜幕的笼罩下回到雨村。路上正遇浇地，虽小费周折却也平安无事。

好心的雨村贫下中农在知青坚持不分队的情况下，他们没有再为难知青而是作了变通：知青从一队和三队退出来，分别去二队和四队落户。一队和三队给二队和四队划拨出相应的土地作为补偿。就这样，我们的劳动权得以恢复。同时我们也告别生活一年多的小营子，来到大营子的二队扎站下来。在以后日子里，我们和宽厚善良的雨村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周而复始。

雨村知青在那个荒唐的年月里，为了改变生活的轨迹主动出击寻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目的就是想把自己的生活变一变而已。他们在只许做规定动作的年代选择了一个自选动作，当然不会得分。■

【述 往】

安希孟回忆录（六）

—— 我与文革

安希孟

位卑未敢忘忧民

1966年红卫兵风乍起，我和刘泽英结伴去清华附中串联学“唐僧取经”，嘛也没取回。后二人一同加入红卫兵师，旋又同时反水叛投“井冈山”，还在饭堂门前张贴“郑重声明”，煞有介事，宣布自即日起退出红卫兵师。找到“井冈山”康健递送了申请，康健说“研究研究”。我心想，我们看得起“井冈山”，你们还研究什么。那时觉着这就是杜鹃山弃暗投明反水入伙而已。我们不是红五类，有些理不直气不壮。

那年冬，我和雷、刘也试图脱颖，办了个钢板蜡纸刻印之《新思潮》（New Ideological Trend），引1918年《湘江评论》毛泽东话：“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想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任务。”文革大串联，我和王尔德、雷天生、韩佳升来到太原南文化宫造大庆展览的反，放了个马后炮。被我们批判的王文章，老红军，后来成了副省级干部。

我和同班来牛新华诸君文革派性斗争中不选边，而是做第三势力中间派取中庸之道（但非逍遥派），不采极端立场，看两边都不顺眼。这一派不知谁匠心独运取名曰“大海航行靠舵手”“联合编辑部”。此乃“海派”的由来。我们临时起意，叫了个“云水怒”“战斗队”。其实没有战斗，没有发过一枪一弹，完全是个子虚乌有。1967年纪念领袖诞，我们出墙报纪念，刘来牛（刘晋）画了波涛汹涌激流飞湍巨轮朝日领袖挥手，隐喻大海航行靠舵手。

1967年3月，我被抽调到社科院和北师大“中央各部联合调查组”，那是中央文革为了渗透到周恩来管辖的地盘，以掌控中央各部大字报上有关李先念

陈毅的意见，反击二月逆流。我被分到财贸口。然而其实没有见到过一张关于他们的大字报。没有任何文字批评过他们。只是有闻必录，但也乏“恶”可陈。就我当时的思想而言，我也是血气方刚，觉得周总理和李先念比较右，多么希望真的能发现有关他们的大字报。我们当时的心态是巴不得捉到虱子，越多越好，可惜没有捉到虱子。“少年心事当拿云”，当时野心勃勃，希望能打活老虎。青年容易被利用。人有虐待情结，希望别人倒霉。肉食者正利用人性的弱点从中渔利。

我最近和一个文革中北京外语学院大学生的朋友交谈，知道他当时的确和周总理陈毅对抗过。他很坦率。不过一番交谈下来，无论如何也不觉得他是坏人。当时青年人热血沸腾，有点冒失，居然批斗陈毅元帅。不过周总理也予以谅解了。据他说，天安门责问周总理的巨幅标语就是他们所为。我当初也觉得周总理讲话没有那几个人过瘾。但总理去世，我们也哭得泪人儿一般，我还制作腊梅树祭悼。

我在中央各部调查组结识了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牟钟鉴、李富华、李兴华诸位大哥哥。起初奇怪怎么还有大学生研究宗教。问他们可不可以结婚，是否必须持斋食素，是不是打到宗教内部窃取情报。后来才知道毛泽东说过学点宗教，又知道同在一个调查组的人观点不尽相同，也有维护李先念李富春陈毅余秋里的。他们后来也分成两派。就是当年真造反的“联队”朋友，他们后来也切齿痛恨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可是又怎么可以怪罪于他们几个文痴书生呢！我因了这点滴社会科学知识，后来就报考了南大宗教研究生，拿基督教学理言说社会问题！

后来刘月英被羞辱得跳了楼。刘月英无辜，当时当局野蛮执法，粗暴无礼，羞辱人格尊严，把兵团扫地出门，对刘月英实行非法野蛮蹂躏，当众羞辱，败坏名誉。出身寒门的刘月英是我们年级唯一一个自行结束年轻生命的人，独女，与老父相依为命，没有任何罪状，没触犯天条，被清查逼命，往死里整。有一分奈何，她也不会抛下她挚爱的人世。她家没有得到任何抚恤。置她于死地的人们依然安享余年，忘了怎样对付一个无辜的生命！她从容纵身一跃——弱女该有多大勇气！

斯人已去。刘月英永成千古。她的同班李秀儒美文纪念，兹录于后——

你文章中提到刘月英和她的死。我们班每次聚会时，还像当年在大学里一样，无论今天何职何位，依然直呼绰号。张仁强（华侨）虽然已是港澳的富商巨

子，我们见面还是叫他“狗肉”。更有甚者，狗肉前在加个“臭”字。他夫人不解：为什么叫他“狗肉”？我们不由得想起了刘月英。1966年，我们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可谓“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那个马列主义大字报，让我们顿时忘乎所以。“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打造红彤彤的世界，舍我其谁？于是，呼吁停课。下午学社论，学毛著。每天下午我们都规规矩矩坐在教室里读社论。张仁强大大咧咧，对政治是怎么回事并不上心。不像我们，个个热血沸腾。他睡醒午觉后，穿着人字拖鞋，踢踏踢踏，一件长到屁股下的白圆领衫，嘻嘻哈哈地来到教室。大家怒目而视。他连连点头，满不在乎地堆着笑脸。

一次这样，团干部忍了，怒视。下次依旧如此。直到有一次，三点多钟，他又姗姗来迟，还是屡教不改的样子，怎么说都是点头哈腰。刘月英怒不可遏。恰我正读社论，社论中有一句“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刘月英接过话题，立即怒斥张仁强“真是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以后我们见面就喊他“狗屎堆”。但是太绕口。吃饭时，又觉得太恶心。土八路袁南炽有才，说叫“狗肉吧！”但刘月英并不叫他。每每看到他，依然横眉冷对。我至今还能想象出刘月英见到狗肉的样子，一个嬉皮笑脸，一个目不斜视。你说刘月英一个弱女子，从四楼纵身跳下，该有多大的勇气啊！她是山东人！别忘了，山东人的性格“士可杀不可辱！”

她是在中南楼的西北角的阳台上跳下去的。恰生物系的学生去打开水路过。人们跑去救她，她发现自己没死，还使劲掐自己的脖子。此时，我们年级正在阶梯教室准备开对兵团的批判会。因为兵团人士被抓走整一个月了。丁峰也在其中。刘月英因丁峰被抓受辱一个月了。

跳楼的前的那个晚上，周一，我在电教馆翻印照片。因为周日时去公园玩，我要把照片洗印出来。回到宿舍已是半夜。刘月英还坐在我的床上，在灯下翻看毛选。看我来了，她起身。我说：“这么晚了还不睡？明天的事别放在心上（第二天要开批判会）。”她去如厕，许久不回来。我也去厕所，问她“拉肚子啦？”没有答复，只听见冲水声。

周二早晨，按照我们宿舍的规定，依然是她打扫卫生。她默默地擦桌子，拖地。事毕。她拉开我的抽屉，拿出镜子梳头。我突然发现，她的脖子周围红红的血印。我吃惊地问她：“感冒啦！去校医院拿点药去！别瞎搓脖子！？”她脸红红的。没说一句话。因为自从军宣队的那位参谋在系里高声且满怀激情用羞辱的

语言宣布：“丁峰还没结婚吧，怎么在房间发现了避孕药”后，刘月英不曾和任何人说过一句话！

坐在阶梯教室的我们等待宣布开会。有人闯进来说，刘月英跳楼自杀！霎时，我们班尤其我们宿舍的人，浑身颤栗！刚分开二十分钟啊！惊愕中，我眼前浮现出第一次见到她的情形。报到的最后一天傍晚，学姐们带到我们宿舍中南楼308一位瘦弱的，身穿粉色条格粗布大襟上衣，天蓝色裤子，脚蹬格子布鞋的女孩。她背着手工做的书包，学姐给她提个大包袱。学姐要带她去饭厅吃饭，她说她包袱里有干粮。学姐说，学校管饭。晚上，她打开包袱让我们吃她的干粮：山东的煎饼。说是村里人用积攒下来的面给她摊的。可以吃一个月。她坐在双层床的上层，看我们嬉闹。我们班来自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福州。我们互相交流各自学校的情况。兴致勃勃。她困了，要我们睡觉。我们说你脱衣服先睡呀！她依旧坐着。

“你怎么不脱衣服？”

“你们关灯！”

“灯绳在你手边，你关！”

“怎么关啊？”

“没学过物理？”

她说是她第一次见到电灯！她和衣躺下。“脱衣服睡，都是女同学，害什么羞啊？”她说，她没有我们那样的背心，短裤。她从来没穿过。于是，我的同学们纷纷打开箱子。崭新的背心，短裤飞到她的床上。“快穿上，穿上！”卢淑娴像大姐姐一样关照着。

她没有褥子，没有枕头。被子是姐姐出嫁时的嫁妆，已是很破旧的粗布里子。她说母亲在她三岁时去世，是他的叔（父亲）把她带大。她在山东益都一中上学。每月回家背干粮。没有菜，是一个鸡蛋换的盐。吃干粮沾盐水。过年时政府发三斤白面。看着学校天天吃大米白面，她说，天天在过年。有时，她故意吃窝窝头，怕忘了本。她有山东口音，发音时常被我们讥笑。她就向我们学普通话。第一学期她从没出过校门。三个月后，她光荣入党。期末考试，她得了全五分。

那年春节，她回老家了。回校时，没有再背大煎饼，给我们带的柿饼和枣。她穿了一身新衣服，还是家里的粗布，手工缝制的。她依然刻苦，依然踏踏实实。

男同学的被褥，她帮着拆洗缝补。她依然没有走出校门，不知道新街口在哪儿。没去过动物园看熊猫。

文革了，她真的满怀忠诚。因为他们家中农出身，她并不十分得宠。可她相信党。没有党，怎么能有她的今天啊！党说的句句是真理，让她干啥就干啥。我们看小说，看英语，她看毛选。记下厚厚的笔记。后来发了各种马列小册子，她就在图书馆认真查阅来龙去脉。

我们发工资了。她每月寄钱给老父亲。把小儿麻痹的侄子带到北京治病。她从没有吃过一次超过5分钱的菜！她依然自己缝制衣服。自己做鞋子。她买了绳子拆线打线衣，还自己染了颜色。她的枕头依然是书。她的褥子依然薄如纸张。还是姐姐出嫁的旧棉被。灯下，她依然孜孜不倦的学习马列毛选。唯一变的是，她和我们认为千不该万不该的人好上了。我们无论怎样的挖苦讽刺，嘲笑贬低那个“小爬虫”，她痴心不改。她终于为他殉情了。

由于她是自杀，医院拒绝治疗。直到当天夜里，上级指示必须手术治疗。她才得以手术。可太晚了！她的马尾神经没有接上。她瘫痪了。

她还是想死。她在医院决绝饮食，决绝活动。

后来她回到校医院。轮流值班的任务交给了我们班女同学女老师。感谢我们的老师们。尽管他们曾经被批斗过，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太太小姐们，可在刘月英身上，他们倾注了母爱和柔情。也许白天要交代，可是晚上在刘月英的病房，他们是母亲，是大姐姐，是慈爱的老师。为她洗澡，搓身，按摩。为她轻轻揉搓头发，为她修理指甲。为她洗下身，为她换例假带。拿去最好的饭菜，自费给她订牛奶，喂她橘子汁……；她从来没有这样享受过啊！仿佛母亲回到了她的身边。

感谢我的同学们。她换下来的衣服，短裤，无论多么味多么脏，我们都给她用开水烫洗干净。帮她练习走路，无论多么累人，我们都愿意让她恢复健康。值班时，我们把一切硬物都从她的床上拿走，怕我们打个盹会发生意外。我们的手不停的为她按摩。盼她早一天站起来。我们期盼那个人回来后能为她的痴心而感动！能和她相依为命。能养她一辈子。她为你而死啊！他去医院看她，说今后愿以兄妹相称。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大骂他的无情。刘月英仿佛什么都明白了。他分配走了。据说只来过一封信。

她必须独立。她不想死，她要活。她还有老父亲。她期望学校能收留她，

哪怕在资料室打打字。为此，她找来英文字典，昼夜练习打字。那个世道啊。

她一次次被送回老家，又一次次被家乡的人抬回来。她绝望了。终于她又绝食了。她再次四十天禁食，她躺在曾经无比信任的党的总支书的办公室里，咽下最后一口气！咽气前，她在想什么？我们无法得知。我们只知道：你有山东人的骨气。士可杀不可辱！

刘月英，你这样走了。

当我们老了的时候，岁月沉淀，你却那么清晰的站在我们的面前。那个疯狂的时代，你是用生命昭示人们：人是有尊严的。

我的眼圈湿润了。我回复：“我已经从文革梦魇中醒来。我知道普世价值。那些置她于死地的人不可原谅。上次北师大校庆外语系65级聚会，我想到过为逝者默哀致祭，但不合时宜。我们下次为逝去的老师学友肃穆静默，或以酒祭奠。把酒酹滔滔呀。”

对于刘月英，应该给与国家赔偿，追究责任人的责任。文革中自杀者夥矣，但1970年已经有政府。北师大文革中自杀者，获得国家赔偿，恢复名誉，或平反昭雪。刘月英亦应得到同样的待遇，羞辱她的人应该受良心自责。

文化革命打破师生界限，我们连起码师道尊严都抛弃了，对老师直呼其名甚至喊绰号。文革有一次下乡插秧劳动总结，“三结合”革命干部系革委副主任柳玲梅说：“有的革命同学大腿被蚂蝗叮咬”。大家大笑，结果传成“革命的大腿被咬”，甚至“革命同学被反革命蚂蝗咬了”。那是疯狂革命的年代，但没有对封建旧制度有少许触动。蚂蝗若咬反革命，那是坏人打坏人，活该！这使得我们打心眼里彻底打消了对干部的素常崇拜。比如北师大三结合干部石森同志，部队政委，不至于没有文化水平，但面对站出来亮相以后的群众，有时讲话掌握不住分寸，没有伦次，大字报称他为“老阿斗”。人妖颠倒哇。法术势者，势使之然也。今天回忆，是要说明，虎落平原，失势了。程今吾校长有骨气，有一次我看见他直面怒视侮辱他的人。他因劳改脸色黝黑。

文革前樊木森叔叔请我看过谭元寿的京剧，可我，说实话，未上心。倒是文革中电视里《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唱段念白倒背如流。不过我老是觉着那个铁梅装嫩。她十七岁了，比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还大，

早该懂得马克思主义大道理。“铁梅呀，年龄十七不算小，为什么不能帮助爹爹操点心？好比说，爹爹挑担有千斤重，铁梅你应该挑上个八百斤。”我伯父叔父十几岁就担水挑土牧羊，我妈十几岁就站在小板凳上擀面切菜。

北师大革委会成立，庄则栋、徐寅生来西饭厅表演过。那时候的粉丝呀。有一次参与地派“揪刘火线”游行，迎面是中国京剧院的几个大腕，好像是刘长瑜、钱浩亮、高玉倩。彼此一派，欢呼雀跃，招手致意。

北师大迎接“天涯若比邻”的谢胡，革委D公说了句“咕嘟拜”（Good bye），被大字报斥为卖国贼，斥他不该说美国话，况且说 English, 也不说高档次一点的。那个年代，说哈罗 OK 就是反革命。

1967年火烧英国代办处，周慧敏不留神代表北师大坐在主席台上，局面失控。她为此在清查“五·一六”时，百口莫辩，浑身是嘴也说不清。火怎么烧起来的，是个谜。但有一点，火是从六月一日火烧炮打砸烂一把火烧起的。娃娃替罪顶包。义和团练大火一烧，她没辙了。清查“五·一六”便拿她是问。后来让攥着大肚子的她站酸了腿交代问题。天哪，这问题鬼都说不清楚。

1969迎九大献礼，张祖荣们编 English《最高最新最活指示语录》！方今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若有螳臂阻挡英语，抵制普世标准共同价值，反对“米达尺”VCD，DVD，奥运诺奖和磅秤，吾侪当敢把皇帝拉下马！

1969年战备疏散转移视线，到东炼劳动，师生同吃同住，打地铺，睡稻草，防止社会帝国主义突然袭击。有一次油罐起火，大家飞蛾扑火，不见消防大队。“大众传媒”也不见片言只语。

与天斗争，其乐无穷。珍宝岛事件后，千里冰封，我们连续游行三天，老太太高万里，瓦利亚，俄国身份，不敢懈怠。苏联大使馆外悬挂稻草人——绞死勃列日涅夫。现在据说珍宝岛已经和解，升平气象。

清查“五·一六”越来越扩大，越来越离谱。普通学生质疑过某人，就是“五·一六”分子。“有思想、有言论、无须行动，同一时期受同一思潮影响的人，皆为‘五·一六’”的定理出笼。逻辑是：1959年彭黄张周并没有共同策划于密室，没有串通，但观点一致，就是反党集团。青年人思想活络，也转变得快。对于卷入某种思潮的青年，大可既往不咎。凤泉林是“五·一六”可疑分子，被隔离审查，看守的老师不让他看报纸，说你应该考虑交代问题啊。他究竟犯了

什么滔天大罪，难道比刘少奇还罪行累累？那时的政策攻心习惯用语是竹筒倒豆子。天哪，何种罪行罄竹难书到三天三夜也倒不完？凤泉林的爱人从锦州到北京探亲，是否让他们晤面成了严肃的问题。左派们认为他们不该会见，更不能同居。

要董连猛交待“九二黑会”的车轮战术，我参加了，坐在后排。但后来越来越觉得这案件离奇虚假，于是消极怠工。当然积极开展斗争的大有人在。有一次我领着他放风去主楼旁边葡萄架下喝凉白开，就大胆和他坐下闲聊。他倾诉衷肠。我表同情，鼓励他大胆翻供！我是内奸！于是失宠于工人叔叔。

后来清查运动炮制的荒谬绝伦之说出台：造反兵团是“九七事件”樊黄李第二套班子，是第五纵队，和谭厚兰演双簧。简直荒谬绝伦。我大胆批评这一胡说，充其量是言论，亦被罢官——继海瑞彭德怀之后，安子文亦被罢官。那个九七事件是几个娃娃头脑一热搞起来的，连谭厚兰也懵了傻了。外语系写作班子红极一时。这应验了“凡是存在的就是荒谬的”。■

【简 讯】

“毛泽东时代的民间记忆及其对历史学的影响”

国际研讨会在法国召开

田三分

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French Centre for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a) 于 2014 年 12 月 15—16 日在巴黎召开国际研讨会, 会议的题目是“毛泽东时代的民间记忆及其对历史学的影响” (Popular Memory of the Mao Era and its Impact on History)。会议分四个议题: “民间记忆的制度化”、“民间记忆的载体”、“反思历史: 草根抵抗运动”、“民间历史对历史学的贡献”。两天的会议, 分别在“巴黎人文之家基金会 Suger 楼和法国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组织方为与会者配备了中英文的现场翻译。

九十年代以来, 出现了一系列关于毛时代的引人注目的共同记忆的表述, 这些包括文学创作、影视作品、学术研究和个人回忆自传等, 它们通过出版印刷、互联网等多种渠道的传播, 对现有的历史编撰构成了挑战。关于历史的解释已难以定为一尊, 这些共同记忆对中国社会具有了潜在的重大的意义。会议旨在为学术界提供一个展示各种形式的非官方记忆或公共记忆 (社会组织, 非官方杂志, 文件报告和纪录片, 口述历史) 的机会, 并希望通过提供与会者的讨论, 将这些形式的记忆转化为对中国历史的理解, 并进入历史的编撰之中。

与会者是来自美国、德国、法国、中国和中国香港的学者, 他们提交的论文如下:

1. 柯克·丹顿 (Kirk Denton,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Ohio State University):
《民办博物馆是否为非主流中国历史提供了空间? ——四川安仁, 建川博物馆聚落》
2. 丹尼尔·里斯 (Daniel Leese, 德国弗莱堡大学 Universität Freiburg):
《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的的不公正: 北京丰台区实例 1978—1979》
3. 吴思 (中国, 《炎黄春秋》主编): 《关于毛泽东时代的集体记忆: 以〈炎

黄春秋》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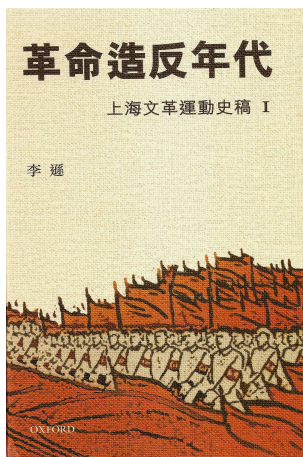
4. 朱迪 (Judith Pernin, 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现代历史研究所): 《记录和重现记忆——右派人士张先痴的两部独立电影》
5. 魏简 (Sebastian Veg, 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 《21世纪关于毛泽东时代的虚构和纪实文学: 杨显慧、杨继绳、阎连科》
6. 白夏 (Jean-Philippe Béja, 法国高等社科院): 《文革前对于毛泽东社会转型的抵抗运动: 积极分子自传里的反对派组织》
7. 冯客 (Frank Dikötter, 香港大学): 《The Silent Revolution 无声的革命》
8. 王爱和 (香港大学): 《文革中的非政治艺术, 个人经历和另类主体》
9. 潘鸣啸 (Michel Bonnin,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 《如何理解知青下乡运动的突然结束以及如何解释新疆的特例——民间历史及记忆在这一课题上的贡献》
10. 丁东: (中国, 山西社科研究所) 《口述历史与毛时代的反思》
11. 启之: (中国,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毛时代的公共记忆及其历史影响——口述历史中的两个文本》

会议期间放映了来自中国南京的独立制片人胡杰导演的纪录片《星火》, 并有专业人士对影片的介绍和分析, 随后安排了观众与胡杰的问答。■

【简讯】

《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两卷本在香港出版

常林



文革史学家李逊女士花费十年心血独立撰写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一书，于2015年1月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ng Kong）出版。这是文革发动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一部全面且详细阐述上海文革历史的重要著作。全文一百万字，共1648页，分上下两册，布面精装，售价港币三百元。

上海文革是十年文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革除了上层的政治斗争，群众运动是其最大特点。文革群众运动由两大部分组成：红卫兵运动，以北京为典型；工人造反派运动，以上海为典型。红卫兵运动到1968年上山下乡基本结束。工人造反派运动到1968年“大联合”也基本结束。只有上海以王洪文为首的工人造反派，通过组织的体制化，基本保留了骨干队伍，在文革政坛上整整活跃了十年。除了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上海还有一支其它省份城市都不曾拥有的文革力量：以张春桥和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委写作组。这股势力左右着上海的舆论，对全国的舆论也起着重大影响。上海的文革由此与中央文革派紧密相连，从1965年的批判《海瑞罢官》，到1966年的“安亭事件”，到1967年的“一月夺权”，到1976年的未遂武装反抗，这支力量始终为毛泽东的文革寻找突破口，忠实地实现毛泽东的心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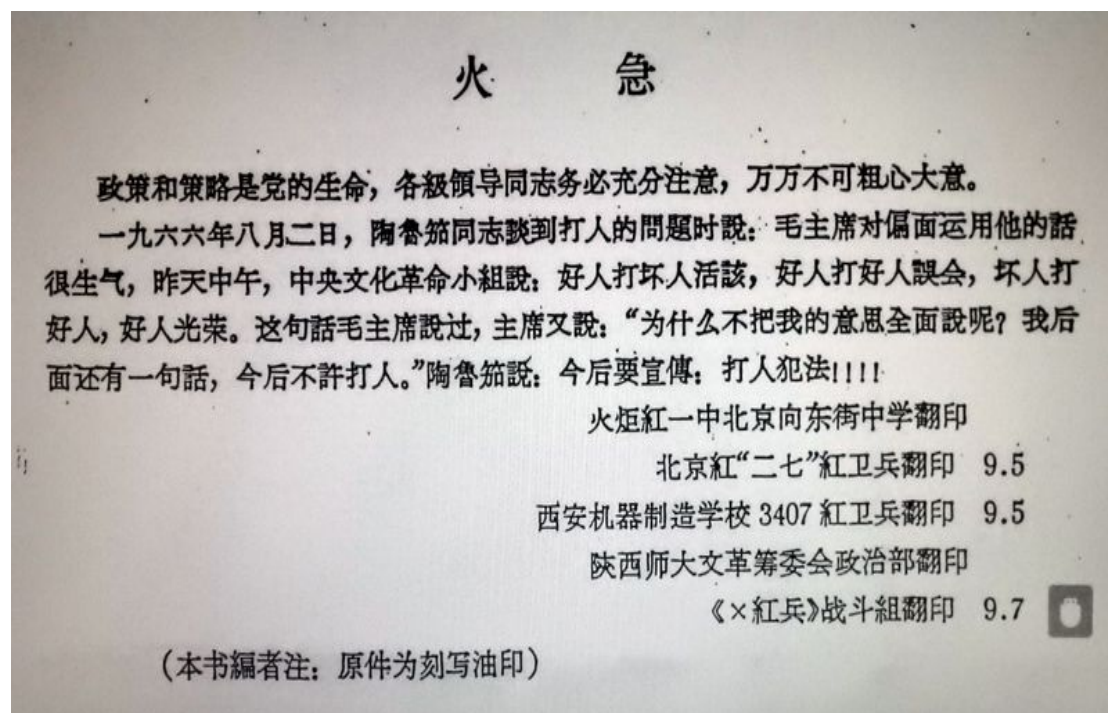
作者关注的不只是“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一月夺权”等重大政治事件，而且关注文革的其它方面，诸如“老保”组织、大联合、科层精简、转型后的群众组织、后期造反派、写作组、第二武装，等等。作者试图通过这样的扩展，引起其他研究者对这些领域的关注，为今后学者的研究提供历史线索。作者的这一努力，也能为过来人重演了历史记忆，为不知文革为何物的青年再现了历史场景。■

【资料】

陶鲁笳传达最新指示：“今后不许打人”

沈迈克提供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陶鲁笳同志谈到打人的问题时说：毛主席对偏面（原文如此——本刊编者）地运用他的话很生气，昨天中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这句话主席说过，主席又说，“为什么不把我的意思全面说呢？我后面还有一句话：今后不许打人。”陶鲁笳说，今后要宣传，打人犯法！！！！



材料来源：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编印的《文化革命资料汇编：西安地区专辑之一》（1966年10月）第244页。■

附：

卜伟华对毛泽东说的“今后不许打人”的论析

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当年是尽人皆知的。理由有两条：

第一，陶鲁笏的讲话在当年即有耳闻，他是在接见北京铁道学院师生时讲这番话的。而且不止陶讲过，江青在7月28日展览馆会上也讲过。她当时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以后不打就是嘛……人的错误思想打是打不掉的，但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了。’”还有，张春桥8月6日在接见天津学生时也说过：“有的同学打了人，思想负担很重。我们不提倡打人，但已经打了，怎样？只好解放这些学生。当时两派学生斗起来了，其实两派学生都是革命的。被打成‘六·一八’反革命的革命同学自己就说嘛，打我们的同学也是为了捍卫党的利益，是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原来对我们没有认识清楚，当成了反革命。这是工作组挑唆的，我们要解放两方面的学生。好人打了坏人活该，好人打了好人是误会，我们不提倡打人，意思是以后不要再打人了。”（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张春桥这次讲话在另外一个版本中记为：“打人我们是不提倡的，但学生打了学生，我们就要解放他们，毛主席说，‘好人打坏人是活该，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戴高帽，我们也不提倡，戴了嘛，就要解除学生包袱。所以我们说，打了也是革命学生。”陶、江、张在这几天都讲了这样的话，很显然是在重复毛的意思。

第二，这符合毛泽东的特点，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他搞群众运动总是讲运动初期不能给群众泼凉水。8月20日，他在林彪转送的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解放军报总编室编）上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8月23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的意见是乱他几个月，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所以当吴德因为破四旧运动的兴起而无力控制局面想请毛来刹一刹这股风时，毛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请注意，毛说的“这样也好”和江青说的“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何其相似乃尔！■

【资料】

关于右派分子戴煌的材料（五）

——1962年戴煌的十万言书

新华社党委办公室印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

第三部分：回北京以后

一、心情的变化

我是怀着凶多吉少、疑虑重重的心情回到北京的。

快离开一分场时，考察团宣布大家的去留：有的到省市，有的回原机关，有的（表现不好的）回原单位处理。我在后者之列。嗣后既有谣言说：对表现不好者有三种处理办法：一种是到内务部在郊区的农场中继续劳动，限期改造，逾期者严惩；一种是在原机关或机关农场劳动；一种（最坏的）是逮捕法办。我估计自己一定又属于后者。“生为共产党人，死为共产党鬼”，没有别路可走，必须提前筹划善后。

一到密山我就给邓岗同志打了个电报，要求让我到大连去看一下已改名换姓的二女儿。沿途的几个大城市也都逗留了一下，怕以后再也看不到祖国的大好河山了。我深知，我并非命该如此。但是，党要我死，我不得不死。申诉辩白，有谁肯听？！

回到北京，很多事情出于意外。保卫科与党委的一些同志对我们还比较热情。他们首先肯定我们都有了一些进步，在生活上也有了安排，粮票、煤票都准备好了，街上买不着的毛选四卷也给我们留着了。这不像很快就要把我手铐脚镣起来的样子。就是说，在饱尝了人生之艰辛耻辱之后，我终于在我们的国家里还能找到光明磊落的地方。在这种地方，我又成了人，恢复了尊严，而不是被任意欺凌、压榨的奴隶与工具。

但是“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冰块不是一下就能消融的。精神不好，身体也不好，整天想睡觉，对人生的一切均无乐趣。在受到不愉快的接待时，忿怨之

情油然而生。

例如：我到保定去看大孩子，丢了粮票和钱，向家里写过信、发过电报，无人回答，迫使我不得不以物抵押，向当地银行暂借了廿元。回社后，我向干部科询问此事，人们严峻地对我说：去找保卫科。好像我是个罪犯，而我历来是不愿意和保卫科打交道的。我觉得，把我与反革命和坏分子平列在一起，成为公安保卫部门的看管对象，是对我的侮辱。虽然，至少在表面上，保卫科的同志对我尚能以礼相待。

刚到居庸关绿化队时，我和梁昌荣铡包（苞）米秆，发现了几个被遗漏的小包（苞）米。肚子饿，不是原因，主要的还是因为烦闷、无聊，想烤烤玩玩，我们就把它们放在取暖的炉子里烤了起来，结果都烤糊了。为此，队长王锡九同志（现在地方部）严厉地指责了我们，说这是“盗窃国家财富”，“思想极坏、极反动”。

我到卫生所去看病，男大夫都是很不耐烦的，往往不诊不问，就给我开方子。我的病不仅仅由于长时间地吃苦受累，精神上收到压抑，根本原因是营养之严重不足。别人不吃牛奶硬要照顾；而我想增加点营养使病早日脱身，却无人问津。因为我不是干部。

我到食堂经理室去换领粮票，到招待所去交涉一个床位，或到别处去办一点琐碎的事务，都好像我是寄人篱下，饭碗放在别人的锅台上，求别人施舍似的，其中尤以秦学同志的夫人和招待所的小刘，态度最坏。

……所有这一切，在我的思想上都有所反应，既自卑自叹，也愠怒含怨。我也认识到这是少数人员本身水平不高，修养不深，以至于未能体现党的政策。但是我又认为，这主要由于自己是个右派分子，别人才敢于宁“左”勿右，不把我当人待。而这“右派”二字，是别人硬加到我头上来的。

与此同时，又有很多情真义重的事在感动与教育着我。在居庸关劳动时，领导人和一般同志，在人格方面是尊重我们的，在生活与劳动方面是一视同仁的，我们的身体不好，也能经常得到物质上的照顾；我的家庭给我寄来包裹，孙书明同志立即叫我回城领取，怕延日到月（邮局对存放包裹的时间有限制——整理者注），营养品变质；我的病势趋重时，也主动叫我到城内来治病修养，修养之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让我干重活，而只是照管开水炉子。这一切，比较起北大

荒来，实可谓远及天壤。特别是我永镌不忘的是党对方约的态度。他一偷再偷，屡教不改，我们都认为他已堕落到不可药救的地步，必须惩罚。而孙书明同志与党委研究后，仍然采取耐心教育和等待其觉悟的态度。袁肖婉要和方约离婚，党组织也一直劝其耐心等待，苦说求全。这种仁至义尽的精神，充分说明了新华社的党组织对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事负责到底的。他们坚信，坏人也会变好，并为此尽了最大的努力。

经过半年多的接触、体验，我终于感到了党的温暖，相信新华社的党组织和领导人对我们的期待是真心实意的。一些不愉快事件的发生，只是由于少数工作人员的态度不当及某些客观条件的限制所致；本人胸襟狭隘，不能重大轻小，也是重要因素。至此，我对党的疑虑才得以消除，心里的冰块近乎融解了。我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东北农场的那一套手法完全背弃了党的政策，“逮捕法办”之类更是胡说八道。

但是，这只是不再担惊受怕，不再挨骂恚气，只是恢复了人的尊严与精神面貌。问题如何解决？前途究竟如何？还是深不可测的。

回到编辑部，我的感慨就更多了。首先，我感激我们的组织和领导人对我的负责到底的诚意。不可设想，如果在我的问题搞清楚之前，就把我弄到陌生的地方去，而这个地方又不能很好地执行党的政策，我将会发生什么事。我忍受也好，我反抗也好，结果只能毁灭自己，也可能给党的利益造成损失。当把我留在了解我的人中间，是设想得十分周到的。党究竟为什么要把我留下来，我也考虑过另外的因素。但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一点，所以倍加感激。

其次，我感激组织和同志们对我的细致入微的关怀、体贴与名副其实的照顾。政治上我又得到了“同志”的称呼，¹可以参加一定的回忆和阅读一部分材料，可以和大家在一起学习讨论并畅所欲言；工作上，领导人和同志们对我是放手和信任的，没有采取操之过急的态度，我没有感到丝毫的束缚，我的正确的意见能够被接受，有偏差的或一时办不到的也能得到说服与解释；日常生活中，我更多地感触到同志式的友谊与温暖。我的疾病、贫困和精神上的痛苦，都能得到党和同志们的关怀、体谅与帮助。我要接孩子，立即给我房子；孩子接来了，大力帮助我报户口；户口批下来之前，很多同志帮助我照顾孩子；户口批下后，幼儿园

¹ 对北大荒式的“同志”二字，我并不稀罕。后来他们嘴上叫你“同志”，实际上把你当做囚犯和奴隶。

立即准她入园。我有经济困难，家庭负担重，组织上不仅让我借款，并且增加了生活费。据我所知，有些人早就摘掉了帽子，同样也是在北京，工资尚未调整，而党对我如此，确实是礼遇优厚了。很多同志对我也一改过去的孤立戒备之风，她们邀请我到她们家里去串门子，谈心，替我做饭，烧菜，代买东西，甚至帮我补袜子。我相信，她们基本上都是诚恳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看来这一切都是些小事，却比空头道理更能打动人心。对这一切，我平常没有表示过感谢，但已铭刻肺腑，死前绝不会忘记。

现在，个人的存亡得失已不能再左右我的情绪，一个人之革命或不革命，不在于其名之扬抑、位之高低、俸禄之多寡、荣辱之轻重，更不在其居于何地、事于何业，根本的一条在于其为何而生和为何而死。“不管如何要革命”，这成了我的座右铭，它使我在非人的生活中能够既有忍耐又有斗争，在动摇和绝望中又恢复了镇静与期待。常为一己之利而绞心耗血，为正人君子所不齿。我也将永远地予以鄙视与唾弃。

这不等于说，我内心中就完全拂却了痛苦与烦恼。现实中的不顺、家庭中的困苦、国事民情的多灾多难、真理与谬误等，不能索然分明，还时常使我忧伤、惆怅、忿怒、激动，直到今天，还有很多老朋友或比较熟悉的人对我相当冷漠。有的人，我如果不向他们打招呼，他们绝不会向我点头；有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谈谈，他们草草地应付一下就避开了；有的人，似乎旧情未忘，一再表示要到我宿舍里去看看，我等了又等，结果只是“风吹影动疑人来”；更有一些人和我狭路相逢时，昂首吊睛，擦肩而过，把我当做空气或瘟疫。这些人是不是真正觉悟很高，思想很红，和我划清界限的呢？远远不是。果真是，我倒可以原谅。老实说，能够把自己的良心公诸于世，毫不欺心地认定我就是个大坏蛋，未必有几个人。他们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一个“怕”字。他们怕受到牵连，怕受到怀疑，怕一但有事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为此，我不能不有所哀叹。我不是哀叹友不能以友情待我，使我痛感形影相吊之苦；而是哀叹如今人情之淡薄，世态之炎凉。他不是对哪个人，而是成了一种社会之风。几千年来，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一直以见义勇为、雪中送炭而著称于世；但是在这几年中，在我们国家内部的生活中，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中，这一光荣而古老的传统残存若失，见义勇为变成了胆小怕事；雪中送炭变成了锦

上添花；赤胆忠心明肺腑，变成了“见人只说三分话”；情谊而不为贵贱、贫富、安危所左右者为数寥寥；披肝沥胆、仗义执言者几乎毫无。为此而痛，远非痛个人之所痛耳！

我家里的人，缺食短衣，瓦破屋漏，病危而不得治。四年前，因我的收入减少，援助断绝，年方卅四岁的唯一的姐姐被结核菌夺去了生命；最近，由于同样的缘故，又死去一个年仅二十岁的侄儿。如果他们是七老八十，难免一死；或成绝症，难以救治；或因突然事故，不幸伤身，虽痛而能宽释。可是，他们均不是如此，而是仅仅因为没有钱，坐视其死去，噩耗传来，不惊而犹痛！！我深知，这不是我的独家之苦，举国皆困的今天，饥寒无以慰，病疾无以救者，我不仅不能聊以自慰，反而痛中生忧了。每当我陷入这种冥思默想，“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欲念是十分强烈的。

为摆脱个人的烦恼，拂尽民间之疾苦，我想高声疾呼我的意念，也想大刀阔斧地去行动，但是，“右派”帽子压迫着我，社会上无数有力而无形的绳索束缚着我。抑郁、彷徨之际，我想到国外去。过去想去苏联，后来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就不想去了；以后想去阿尔及利亚或印度尼西亚，当一个协助民族解放斗争的志愿军；最近，又对古巴发生了兴趣，认为卡斯特罗是“青出于蓝”，在发扬民主、深入群众、勇于认错改错等方面比我们做得好；这些目的均达不到，则去香港，哪怕是做一名苦力，也能够搞点进步事业。我无意于背叛祖国、弃绝革命，只想在心情舒畅中革命。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和自己的同志也许和一个赌气出走的年轻人对他的家庭的情感相比拟：家庭是神圣的，可爱的，而与父母手足之间的关系是不够融洽的。他觉得对他们有愧，同时又觉得他们对他不起。在一时还不能完全消除不愉快的因素之前，先到外面去走走，也许是比较合适的。虽然他对家庭是十分依恋的，对父母和兄弟姐妹仍然是有感情的。

我的心情虽十分复杂，瞬息万变，但忧郁和痛苦又不是我的生活的全部。在相当多的时候，我又是十分平静、爽朗、愉快、达观的。在工作之余，我常常集中精力于学习、观察事物、整理材料和进行业余创作（不一定要发表），来湮没、消融或暂时摆脱纷至沓来的痛苦与烦恼。总的来说，我尚能够控制得住自己，尤其在目前这样好的境遇之下。我不愿意做一个庸碌之徒，不会让无谓的烦恼与俗念吞噬我的生命。（未完待续）■

【读者来信】

1. 汪春劼的感想

在2015年的第一天就收到贵刊，且贵刊上还有我的涂鸦，非常高兴！这期辛逸的文字很有厚度，具有冲击力；小鹰是哪位大侠，文章写得那么有穿透力，期待着能读到他更多的文字。

2015-01-08

2. 庄菁瑞、邵小鹰谈辛逸的《新瓶装旧酒》一文

本期我喜欢《新瓶装旧酒》这篇，记住了卡尔的话：“历史的本质在于以当下的眼光看待过去，根据当前的问题看待过去，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不在于记录，而在于评价。因为，假如历史学家不评价的话，他又如何知道哪些东西值得记录呢？”

很赞同作者的观点：“历史学家选择什么样的历史研究对象和怎么诉说它们，其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史学家的思想倾向和价值追求。正是史学家独自的思想和视角，将浩如烟海、凌乱纷繁的史料串联、构建成一个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使读者能够在往昔和今日之间自如穿越，在对历史的阅读中获得愉悦和教益；正是史学作品的思想性，才使久远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在人们“需要”的时候，被史学家及时地“发现”和推介，在其被不断地挖掘、梳理和书写中历久弥新；正是隐含在历史著述中的独创性观点，不断赋予史学研究以新的生命力，将历史书写变成当下的利益表达，从而使史学成为显学。所以，**第一手的史料和独创性的观点这两个要素在史学研究中同样重要、缺一不可**。一流的史学作品应该是以前人未曾使用过的材料，在生动地诉说历史故事的过程中表达作者的独创性思想。”

这篇文章让我对历史研究的目的和作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好文！

个人理解：导致作者批评的写作方式日渐流行的原因，一是那些写文的人根本没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只能如此含糊地处理；二是虽然有观点，但“不合时宜”，所以不愿写得太明白，以期顺利出版。

荷兰 庄菁瑞

初读辛逸的专论，感觉有点枯燥繁琐，可能是所评论的书的内容太专太细了，不易跟随。硬着头皮读了几遍之后，竟也看出些眉目，明白了作者的褒贬所在。他提到的治史方法是个重要的问题，特别是他引用陈独秀的文章，及胡适给罗尔纲的信，都发人深思，值得进一步研读。不过，可以商榷的是，“中央决策——地方传达——乡村落实”的三段式是集权国家的政治操作方式，这是个史实，不会因历史的不同“写法”就可以改变。我以为，评价史学，重要的是，要看史学家是否能够通过事件与资料的科学描述和分析，以数字和公式，来揭示出社会的真实关系？因为只有关系才是本质。

此外，“大胆假设”要在长期大量的资料积累的基础上才有意义，而“小心求证”也不是随意取舍材料以适合假设的过程。成功的颠覆性理论学说不是每天都会有的，因而似不宜太苛求作者。

美国 邵小鹰

版 权 声 明

《记忆》创刊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